

0509

东胜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东胜文史资料



政协东胜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

# 东胜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东胜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

东胜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东胜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

鄂尔多斯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0 字数：80千字  
印数：1—1000  
1994年12月出版

EA60/17

编 审：千阿木尔 刘学无 富长青  
主 编：万淑娟  
编 辑：王树成 白万斌

# 目 录

我在东胜县工作的回忆

..... 赵锦玺供稿 王金虎整理(1)

新政权建立之后..... 周树云(18)

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情况和几次运动

记述..... 周树云(45)

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 周树云(65)

风味殊异的梁外饮食..... 何知文(98)

灶火壕大渠的形成及水利的发展

..... 白述英(107)

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 何知文(112)

东胜地名略考..... 黄开学(173)

野味滋趣..... 春 天(189)

---

# 我在东胜县工作的回忆

赵锦玺供稿 王金虎整理

1961年1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东胜县委书记。吴国柱任书记、县政府县长,朱邦仁、郭治祥任书记,尚满堂、刘立生任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武根斌任县委常委、监委书记,苏汉源任县政府副县长。

全县总面积达2200平方公里,是伊克昭盟的最高点,平均海拔为1460.6米。东部是沟壑纵横的丘陵山区,西部系黄沙迷漫的沙质丘陵地带。境内山是光山,川是干川,土质贫瘠,十年九旱,五灾俱全。沙化、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风蚀、水蚀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3.5%,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差。群众形容说:“风沙大,雨量少,种得迟,冻得早”,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东胜县的自然特点。

解放后的10多年里,全县政治、经济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农牧业生产低而不稳,仍然属于贫穷落后地区。

1961年,全县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春天风沙特别大,西部社队有的连种四、五茬还难捉全苗。全县有6.5%的耕畜瘦乏拉不动犁。广大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春播后,干旱持续,60多天没有下一场饱满雨。夏锄的紧张阶段,又出现了虫灾。而在七、八月份却阴雨连绵,集中降水量达160多毫米,又遭受了涝灾,部分社队还遭受了冰雹的袭击。全县受灾面积达30.18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64.66万亩的46.4%,其中无收成面积达11.62万亩,粮食总产量2783万斤。牲畜纯减19.5%。

我到东胜后不几天,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深入到受灾害严重的社、队,协同社队干部调查灾情以及群众生产和生活状况。通过调查摸底,全县严重受灾的有3040户,达9068人。对特别困难等不到粮食入库后再作返销供应的队和户,采取就地划拨粮食的措施,安排他们的生活。同时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发动和

帮助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和抗灾保畜工作。将国家下拨和自筹的 7000 元救灾款、1300 公尺棉布、200 斤棉花、181 立方木材、7 万斤碎米、7 万斤细糠、2.5 万斤黑豆及时拨放下去。泊江海子公社一位农民拿到分给他的救灾款物时，激动不已，嘴唇哆嗦着说：“还是毛主席、共产党好啊！民国 36 年灾情没有今年重，而 37 年却死人无其数。今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早就给我们拨来救济款物，不让我们挨饿受冻。真是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1961 年 12 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农牧业生产形势，总结了农牧业生产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发了《关于一九六二年发展农牧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全县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压缩耕地面积、充实生产劳动力、加强劳动管理、实行科学种田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1962 年元月初，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全面总结了 1961 年的工作，部署了冬春整风整社任务和农村手工业生产和其他工作。决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为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



产,补充粮食、肉、禽、蛋以及煤炭等商品供应和运输短线,进一步活跃城乡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必须品的供应,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安排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和措施。为了以点带面,树立样板,县委在原红泥塔和灶火壕两个点的基础上,增加了柴登大队和马莲圪卜大队两个点,之后又增加了色连、石畔两个大队为点。抽调和配备了由县委、政府领导牵头的蹲点工作组,长期蹲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指导全县的工作。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我和郭治祥出席了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2月27日至3月8日,县委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郭治祥同志结合东胜实际,传达了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并代表县委作了《关于东胜县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基本工作总结(提纲)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经过与会同志的讨论,大家认为:1958年至1961年的4年中,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尽管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但是,粮食产量增加,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和商品羊增多,工业总产值增长。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认真检查总结了过去4年工作中的失

误。大家指出：过去指标高，口号多，时间短，要求急，不因地制宜，不考虑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人民的思想水平，急于过渡，扩大公社体制，扩大社有经济，急于从队有经济过渡到社有经济。县委曾批转了工作组在羊场壕公社建立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报告。在城镇将合作性的厂社变为国营企业。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过猛，1960年比1957年增长1倍。由于农村强壮劳力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劳力减弱，对此群众形象地说：“农村留下的劳动力是老愚公、余太君、小罗成和穆桂英。”由于夸大了主观能动性，所以脱离了客观现实。在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基本成熟时，还提出粮食产量翻一番的口号。在工业上提出“千厂县”、“百厂社”。有的社号称一夜办起几十个厂子（把社员扎笤帚、栽扫帚、缝拍子，甚至纳鞋底都称为工厂）。在商业上开展了大购大销，无人售货的办法。此外，还有一夜食堂化，三天消灭私有制，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大办气象，大办档案等。同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挂黑旗和戴红、蓝袖章及打分、坐

火箭、坐汽车、骑驴、骑猪等评比竞赛活动。这样给被评为后进的集体和个人增加了许多精神负担。如罕台公社一个生产队被插上了白旗，生产队干部编了一段顺口溜：“白旗插在我们队上，象刀子扎进我们的胸膛，我们以火箭的速度，迎头赶上。”有位社员被戴上蓝袖章后，当即痛哭流涕。这些不仅没有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反而给群众造成了精神紧张与思想负担。

为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县委和县政府于1962年5月15日做出了《关于调整人民公社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对农业生产计划、包干指标、社员口粮分配、退赔兑现、民主补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等一系列问题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为了调整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制发了《关于改善与工商界合作共事的试行办法(草案)》。

1962年7月，县委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和安排了当前的农牧业生产，整顿社办工业，压缩城镇人口，加强战备，甄别平反，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等工作。将

原有的10个国营企业调整为2个,3个手工业合作社调整为13个,38个社办工厂压缩到4个。精简城镇人口3579。对1958年以来全县受过处分的786人中的447人予以平反昭雪。在商业系统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整风运动。恢复了供销合作社机构和集市贸易,发展和健全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在农村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精神,将原来的4个人民公社调整为7个,6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64个,366个生产队调整为429个。建立了各级社队管理委员会,县、社两级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了大队的领导力量。同时将耕畜、农具、土地、运输工具以及作坊等分别下放到生产队经营,并对社、队的财务进行了清查和处理,从而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调整和改变社队经济体制的同时,对社队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充实、健全和加强了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生产队党小组或党团混合小组。

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县委作出《关于加强生产队工作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县、社

两级派出工作组,深入到贫困队和后进队帮助改变落后面貌。下乡干部与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业生产和收益分配上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作业包工、农业生产作业小段包工、定额管理以及基本劳动日制和评工记分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责任制。

经过具体的调整和整顿,基层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管理能力有了提高,农村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劳动力达到 18089 人,比 1957 年增长 17%;耕畜达到 8462 头,比 1957 年增长 8%;木轮二饼子车发展到 4276 辆,当时农村较先进的运输工具——胶轮大车发展到 246 辆。耕地面积有所压缩,植被得到恢复。在纠正“五风”和“一平二调”以及退赔兑现、压缩城镇人口等工作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962 年 12 月,召开了中共东胜县三届二次代表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听取并讨论了县委《关于 1963 年至 1967 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的说明》。确定了东胜县“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提出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在粮食总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压缩耕地面积,固定轮耕地,禁止开荒,保护牧场,使农牧业生产得到同步发展。

1962年,尽管广大干部和群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这年,粮食总产量只有2297万斤,比上年减少20%,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仍处在困难之中。为此,县委、县政府不得不全力以赴抓抗灾救灾工作。号召干部群众广开门路,大搞副业生产和小秋收,增产节约,灾年灾过,做到保人、保畜、保生产,努力渡过灾荒。

1963年4月,县委、县政府联合召开了农业水利三千会,集中部署了水利建设。根据东胜县的自然条件,必须抓好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水利建设。重点放在大川两岸、小沟河畔和下湿地上,力争每户完成1亩旱涝保收的保命田。同时制定和修改了《关于加强生产队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两个指示》、《关于林业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和《关于辅助贫困队发展生产的意见》。我代表县委作了《认真贯彻生产建设方针和当前生产任务的报告》。

为了搞好全县生态环境的治理,在充分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县政府于8月份制定了《东胜县水利保持五年至十年的综合治理规划》。后来还制定了《东胜县十八年水土保持治理规划》。这些《规划》从东胜自然条件的实际着眼,确定了治理的目标和相应的措施。贯彻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精神,坚持了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沟坡兼顾,以坡为主,治管并重的方针。采取以生物治理与工程治理相结合,以种草种树为重点,打算艰苦奋斗五至十年,努力实现《规划》确定的目标。

1963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东胜县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集中研究了1961年6月以来,两年半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及其经验与教训。会议认为:东胜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牧各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城乡人民吃、穿、住都有了明显改善。主要表现是:(一)在农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整风整社十二条,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草案),以及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劳动力达17251个,创历史的最高水平。耕役畜

达 9357 头,比 1957 年增加了 630 头,胶轮大车达 325 辆,其他小农具的生产和供应基本满足需要。农牧业科技生产有了发展和进步。体制经过调整和整顿,稳定了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健全了经营管理制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县贫困落后的三类生产队,由原来的 91 个减少到 53 个。1961—1963 年虽然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但是,随着全国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东胜县的经济也一年比一年好。到 1963 年,粮食产量开始回升,总产量达 2498 万斤;牲畜总头数达 199930 头(只);林业和植被建设初见成效;水利设施大有发展,全县水土保持面积达 207.5 平方公里;电力和机械提水达 53 处,城郊有 202 户居民解决了照明用电。

(二)工交战线贯彻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整顿生产秩序,加强经济核算,健全生产责任制,改进经营管理,劳动生产率上升,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品种增多,国营企业基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手工业上交利润逐年增加。小农具生产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销往外地。

(三)财贸工作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积极组织工业品下乡,农牧土特产品与



三类物资上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断增加,呈现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局面。(四)财政金融工作贯彻了两个“六条”规定和有关方针政策,一方面积极发放工农牧业贷款和下拨支援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节约储蓄,组织货币回笼,大大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五)精简城镇人口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60年城镇人口为33534人。到1963年精简到16623人,使城乡人口比例基本趋向合理。城市人口的减少,不仅减轻了粮食消费和工资支出,更为重要的是充实了农牧业生产劳动力。(六)三年来,虽然经济有了全面的好转,但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连续不断,给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困难。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共发放返销粮140多万斤,救济款403800元,棉布20900尺,棉花550斤,衣服5200件,木材181立方米,使广大群众渡过了难关。

会议还检查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县直机关开展“五反”工作的情况。通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对农村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清除了犯有严重错误、失掉共产党员本色和阶级异己分子11人。城镇机关根据中共中

央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共揭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 97 起,总金额为 11.5 万元,其中千字号的 5 人,贪污金额 1.6 万元;损失浪费金额 27.4 万元;积压商品损失 13 万元。

全县城乡经过整风整社、“五反”和整顿党的组织,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按照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吸收新党员 93 人。截至 1963 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 978 人,党支部发展到 97 个。

1964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共抽调 1510 人,在全县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从解放初期的 23912 人增加到 1964 年 6 月 30 日的 62808 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3.3%。人口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同年 9 月,县委召开了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在西安召开的水保会议精神。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经济建设、军事建设、培养接班人的三项重要指示,研究了东胜县经济建设问题。为了进一步有计

划、有目标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拟定了《1965—1970年六年综合发展农牧林(草)水规划决定(草案)》。号召全县干部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动员起来，自力更生。有山必治，有沙必固，有水必挖，有林必护，有田必保，林牧上山，农田下川，向川沟要地，向洪水要粮，林草促牧，以牧保农，农林牧结合，努力实现六年发展规划。贯彻稳定、全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的生产方针，集中力量抓好草原建设，改良畜种，积极推广新疆细毛羊和三河牛，不断提高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大兴植树造林之风，动员群众开展以种树种草种柠条为重点的植树种草运动。建立四级苗圃，限期达到苗条自给，建立和发展县、社、队林场、水保站、治沙站、试验站。有计划地开展封山、封沙、封滩育林、育草建设。积极引进和培植经济价值高的松、柏树和其他经济林。县委决定以阳塔大队和郝家圪卜生产队为果树生产试验点，并创建了县级果园，结束了东胜没有果类生产的历史。

为了从根本上防治风沙侵袭，除在东部的丘陵山区植树种草，封山育林，搞好水土保持

以外,县委决定在西部沙质丘陵地区,营造贯通西部全境的7条大林带,从根本上解决东胜县的防风固沙问题。这个规划是北至达旗与东胜县的接壤地,南接伊旗界,西顶杭锦旗界,由西向东到我县的海子湾、城梁大队一带,每条林带宽1华里,然后因地制宜地扩展。并规定了统一的标准要求,属于哪个社队的地域,由哪个社队负责种植和管理。实行谁种归谁,谁种谁管的政策。但是,这个规划遭到“文革”的破坏,除巴音敖包一条基本建成,石畔地段的一条部分建成外,大部分规划没有实现。

这段时间,东胜县的生产方针是正确的,大抓了种树种草、植被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虽未上去,主要是大量压缩了耕地面积。牲畜明显增加,到1964年牲畜头数达22万头(只),比1961年增加7万头(只)。

同年10月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布置了后段任务,组织参观了治沙造林先进单位——达旗园子塔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民学人民解放军的活动。

此后,根据内蒙古党委和伊盟盟委的统一

部署,我和另外两名常委参加“四清”工作。经请示批准,建立了临时常委领导班子,负责全县的工作。他们是县委书记郭治祥、朱邦仁,副县长刘立生,监委书记武根斌,组织部长李青山,法院院长康德功。

1965年,在县委临时常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除因长期干旱,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外,其他事业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当年造林25019亩,零星植树796000株,育苗73亩,栽风界林35897亩,新建林场4处,队办林场16个,组织林业专业队161个,完成水土保持面积78.4平方公里,修梯田1211亩,修理塘坝30座,打井119眼,改造盐碱地1750亩,新增灌溉面积2549亩。工业总产值完成372.8万元,比上年增长14%多。特别是宣传教育事业成绩更为显著,公立小学达到23所,工矿企业办学两所,入学儿童达10417人。发展了普通中学、农业中学和业余教育。幼儿园入园儿童达105人。农村办起了流动图书站40个,俱乐部112个。架设有线广播线路2654公里,有3个大队95个生产队通了广播。培训不脱产卫生员205人,接生员

33人,并为城镇培训计划生育工作积极分子  
86人。

# 新政权建立之后

周树云

## 废保建政

东胜这个地名由来已久，有其令人感慨追忆的往事。这里很早就居住着勤劳勇敢的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民。秦始皇修直道通过东胜，自此打开了东胜与内地关中联系的门径。明代洪武年间修筑东胜城，后被淹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东胜厅（厅址在今罕台乡的板素壕），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将东胜厅改为东胜县。

建县初期，辖境包括现在的大部分地区和伊金霍洛（郡王）、杭锦（扎萨克）、鄂托克等旗的汉族集中居住区，为互不相连的几块“插花地带”。国民党为了巩固这里的统治而派官驻军，设区、牌、闾、邻为最初的基层政权机构。后又废除牌、闾、邻改为区、乡、保、甲。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几经变迁，反动统治阶级在这里苦心经营了40多年，使东胜的政权机构从上到

下都比较完整齐全。1948年以前,国民党在县里设有县党部,各乡设立了区分部。“9·19”起义前,县政府设有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人事室、警察局、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全县辖有8个乡,30个保,289个甲。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这一伟大战略方针的感召下,国民党的军心大乱,东胜县的反动势力也恐慌不安。以傅作义、董其武为代表的国民党将领们,接受了和平解放绥远的伟大号召。东胜县也得以和平解放。我们党对“9·19”和平起义的政策是:“对起义人员包下来,团结使用,教育改造。对起义前的历史罪行,在不继续搞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下,既往不咎。”不久,我党即派冯开选等同志对东胜县的旧政权进行接收。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50年的3月15日将这个烂摊子接收完毕。对旧的县、乡工作人员凡是参加了起义的全部包下来,安排了工作,有的按原职留用。这时伊盟盟委通知冯开选为东胜县委书记,刘忠亮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徐凤翼为组织部长,云开雷为组织部副部长兼管统战工作,以上均为县



委委员，组成中共东胜县委员会，展开了党的工作。同时任命冯开选兼任东胜县县长。在中共东胜县委的领导下，本着废除旧制度，实行新政策的精神，对旧的政权机构从县到乡进行了彻底改组，这就是当时提出的废保建政。县人民政府仍保留了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废除了警察局，新建了公安局，废除了人事室，新增了秘书室。还成立了东胜县减租反霸法庭。审判长由冯开选兼任，副审判长由公安局局长李玉鹏兼任。根据1949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各级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在中共东胜县委的主持下，于1950年3月23日至29日召开了全县农牧民代表会议。会上县委作了政治报告，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管理国家大事。东胜的农牧民代表第一次参加议论国家大事，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同年7月15日至20日，召开了东胜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78人。会上县委作了

“废保建政，剿匪肃特，减租反霸，除烟禁毒，扩大再生产”的动员报告，要求在全县城乡开展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会议选出了东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任刘忠亮、副主任李成才、秘书长李直哉、常务委员李凤翔、焦钟汉、庞仲贵、梁生华、戴玉喜、苏汉喜。会议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会议结束后，县里抽调干部深入各地帮助基层开展了各项工作，得到了全县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一个以“剿匪肃特，废保建政，铲除鸦片”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9·19”起义后，将旧东胜县的一部分台站区的“插花地”划归原所属旗，下余的乡、保、甲，于1950年的7月中旬进行了新政权的组建工作。把原来的忠恕乡、仁乐乡合并为一区，辖四个行政村；孝友乡为二区，辖五个行政村；和睦乡、义勇乡合并为三区，辖六个行政村；平治乡为四区，辖三个行政村。全县共有4个区。

18个行政村。把全县所有的甲归并为102个自然村。东胜城镇设立了街公所,由县直接领导。各区派了区委书记、区长、副区长、文书、民教、财粮、公安助理员。行政村设正副村长,民兵、治保、妇女等组织。街公所派了镇长、副镇长。各自然村设村长(主任)。至此,从县到自然村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人民政权。胜利地完成了废保建政的工作。大量的基层干部经过10天半月的培训就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是起义人员继续留用的,有一部分是伊盟干校经过培训输送来的。这是建国初期的第一批干部,是建设新政权、新东胜的主要力量。我们党依靠这批干部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开展了各项工作。这批干部除一部分起义人员、农会干部和有点文化的人年龄大一点外,其余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走过不脱产——半脱产——全脱产的过程。白天开会搞生产,晚上常住扫盲班,干中学,学中干,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考验,除个别人由于种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中途离队外,绝大部分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长

为东胜县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东胜县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继承了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各条战线上埋头实干，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造东胜，建设东胜，默默地奉献着，在艰难曲折的前进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 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成立

东胜县和平起义解放后，虽经过接收政权、废保建政，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剿匪肃特，巩固新政权，建立革命新秩序等各项任务十分繁重。土地改革没有进行，封建地主和农民的这一主要矛盾尚待解决。要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工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什么事情也就好办了。旧制度、旧政权刚刚废除，新制度、新政权刚刚建立。要让人民

群众了解党的政策主张,自己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要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活动。

当时解放区来的同志很少,盟里有个文工团还是接收的旧晋剧班子,主要演传统节目。这样繁重的宣传任务,除了各级干部之外,有很大一部分要由学校来承担。那时我在东胜一完小当教员。县委每次给学校布置任务,要求组织教师和大一点的学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县委宣传部、县团委派专人来帮助,如当时的刘新阶、李振飞、闫海、赵如英等同志经常来学校工作,给予提供宣传材料,帮助审查节目内容。经过努力,于1950年冬季,东胜县一完小就组织起一个大型的秧歌队,一些年轻教师带头参加秧歌队。这可是个新鲜事物,不仅带动了学校的学生,就连东胜街上的青年市民也带动起来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主要是扭秧歌。当时把是否参加秧歌队,做为是否接受新思想的标志之一。另外还组织了一个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开头是排了一部分小型歌舞节目,在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和节假日进行演出。当时演出最多,观众最欢迎的就是《兄妹

开荒》、《夫妻识字》等小歌剧。后来根据群众的要求和东胜文化落后以及发动人们念书识字的需要，以教师为主排演了大型话剧《不识字的痛苦》。通过这个剧的演出，掀起了群众识字，送子女入学的热潮。东胜一完小原有 100 多名学生，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增至 270 多人，还办了两个成人扫盲班，当时叫速成班。到 1952 年初学生发展到 300 多名。

1950 年下半年，伊盟的党、政、军机关由新街搬到了东胜。城镇人口猛增，这对办教育很有利，开展各项宣传活动的任务更重了。盟、县教育部门也经常给学校布置任务，要求学校面向群众、面向社会，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以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要求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党的各项工作鸣锣开道。根据上级党政机关的要求，一完小的文艺宣传队只演小剧、话剧已不能满足要求。这就需要排新戏，演歌剧，演大一点的、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戏。但是继续加强宣传队工作，要增加乐队，学校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只好邀请盟、县党政机关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也参加一完小的文

艺宣传队。如当时的盟财政处长闫耀先、盟法院院长贾文华、盟文教处处长汪振东及科长腾志一、邵其昌等同志都成为这个宣传队的义务乐队成员。他们都是自带乐器，每天晚饭后参加排练，参加演出。每次排练、演出都要干到深夜一两点钟。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排出一个大型歌剧《胡老套投亲》。剧情是反映解放后翻身农民正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热火朝天搞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而胡老套这个翻身农民却不务正业，通过党的说服教育走向正道的转变过程。演出时间约四个小时。演这样一个戏，光剧中人物就有近 20 个，加上乐队约三十多人。我们这个队伍有干部、有教师、有学生。那时人们的思想很活跃，热情也很高，只要通知一声，都能按时到齐，不论是处长还是一般学生，全是白尽义务。大家都很守纪律，说干就干，说干多久，就干多久。休息时间，大家又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我这个当导演的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长，遇到问题，特别是剧情处理，表演技巧，都由大家边排练、边讨论、边改进。演出一次组织一次讨论，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不断完善。这个剧先后共演出十多场，场场都挤

满了人,大约有一万多人(次)观看了这个剧。1951年的全盟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演出后,受到了盟党政领导的表扬,并赠送了两米多长的大锦旗一面,以资鼓励。

盟县干部参加我们的宣传队,给我们起到了带头作用,推动作用,提高作用,使我们全体师生受到了教育,坚定了信心。但是干部、职工参加学校的活动,也有一些矛盾,干部流动性大,保证不了排练和演出。有时由于一两个人下乡外出,就不好完成任务了。于是我们研究确定以学校师生为主,特别是乐队要有自己的人手。学校经费少,我们就自己拿钱买了四胡、二胡、笛子等几件简单的乐器,其他的乐器借着用。校长李静泉,教师白天佑他们有一点老功夫能拉四胡、二胡,可是不识谱,学起新歌新调很吃力,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和康振孝老师一起开始学习拉胡胡吹笛子,还有一名学生叫冯生元会吹笛子,就这样每天排完戏已是深夜了,还要学习一两小时,照着简谱学拉一些简单的曲调。经过半年多的苦学苦练,我们几个人凑合着能够上台了。每到演出时,邀请的同志们能参加,乐队就气派的多了,如果他们来



不了，我们几个人也能基本保证排练和演出了。那时东胜街头能够搞文艺演出的还有伊盟干校，他们虽然实力雄厚，但是学员流动大，学制又短，排一个戏，演一两次就人员不在了。所以能够坚持经常活动的就是一完小宣传队了。解放初期，人们急于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演的新戏又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群众就更爱看了。每次在广场（现在盟行署东南斜对过）演出，大约都有上千的观众，远近十里八里、三十、二十里内骑马的、坐牛马车的也前来观看，有一次我们安排的节目演完已是晚上 10 点多钟了，可是还有往来赶的观众，听说有的是从伊旗、准旗来的。宣布演出结束，观众就是不走，于是我们又安排了两个小时节目。这才满足了当晚从远道赶来的观众。

1951 年的春夏之交，内蒙古歌舞团首次来东胜演出，正好住在一完小的教室里，这不仅给东胜人民大开了眼界，对我们一完小的宣传队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演出前后的空余时间，请歌舞团的同志给小学生排练小节目，如蒙古舞、二人转、表演唱等十几个精彩节目，老演员给小演员教得很认真，小演员如尹

风贞、尹桂贞、邵秀荣、王秀花、冯明玉、冯明明、刘喜英、李秀芝等同学学得也很用心。歌舞团住了十多天，使一完小的文艺宣传队在表演艺术上，基本功的训练上，有了新的提高，又丰富了节目内容。这算是送上门的一次短期的专业训练。

东胜县一完小的文艺宣传队在盟、县领导的重视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部分年轻教师积极参加，热情很高。经常参加演出和组织活动的有：周树云、康振孝、边崑山、边崑山、白天佑、杨宜华等同志。学生、教师大约有40多人。如果是秧歌队演出时，几乎是全校师生都出动。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了教师、学生的革命热情，他们都积极向上，认真教书，认真学习，尤其对教师的思想是个大解放、大提高。对学校来说，取得了教学相长的效果。在社会上，不仅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51年夏天，快放暑假时，有一天县委通讯员通知让我去县委一趟，书记找我有事。我去了县委书记办公室，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忠亮同志对我说：“你们

学校的宣传队搞得很活跃，当前全县正在搞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根据工作需要和群众的要求，想请你们组织一个精干的宣传队，由你负责，县委再派几名干部，利用学生放暑假的时间，深入农村，利用文艺演出，口头宣传等形式，在全县搞一次宣传教育活动。一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群众的斗志，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个宣传队是县委派出的，你看有什么困难需要县委帮助解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组织上只要给任务，就认为是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可当时由于激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竟没有开口，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吱吱唔唔地坐着。刘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县委帮助解决。任务是艰巨的，也很光荣，搞好党的宣传活动，就是对当前正在搞的三大运动的重要贡献。革命工作就是边干边学，这对你们青年教师、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这时我的头脑清醒了一点，虽接受了任务，但我也提出了一些困难。一是服装道具一无所有；二是乐队自己

正在学，城里演请人帮忙，出去演就困难了，自己的乐队又怕出丑；三是演员大都是些小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二岁，自己行走怕有困难。另外感到任务艰巨光荣，但就怕完不成。刘书记当即表态：“这些问题，县委都已研究过了。服装道具你们可向城里的工商业字号张口，让他们自愿捐献一点，给多少，算多少，钱物都可以，但不能强迫命令；县委给你们拨款 200 万元（折现在人民币整 200 元）购买一点简单的乐器和办公费用；交通工具已通知各区，让区上派马车接送你们。再的困难县委相信你们能够自己克服，也相信你们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个表态，这个答复，出乎我的预料。那时 200 万元这么一笔经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一个捐献，一个 200 万元，又派车接送，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重要问题，重要困难，县委都想到了，都已解决了。接着，刘书记对现成的节目进行了了解，对下去后要注意党的方针政策，注意宣传效果，注意群众纪律，注意安全等都作了指示。同时宣布了县委的决定：宣传队的队长周树云，副队长康振孝，指导员是宣传部的干事李振飞，团委的干部闫海、赵如英为

队委会委员，五人组成宣传队的领导班子，演员不超二十人。

我回去向校长李静泉作了汇报，李静泉说，文教科也通知了，学校坚决支持，坚决拥护县委的决定，这是关系学校的一件大事，我们要全力以赴搞好这一工作。于是我们就组织学生秧歌队，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向大一点的商号讲明来意，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像当时的天义成、三义成、东顺成、三盛公等商号捐献可观，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简单的服装道具就基本上解决了。经过认真筛选，决定了张贵和、冯明明、尹风贞、李秀芝、冯明玉、尹桂贞、郭雨林、孙玉才、王玉田、邵秀荣、王秀花、李润德二十名学生为宣传队员。宣传队组成后，县委领导多次开会研究，反复交代任务，明确职责。对宣传内容，宣传材料，宣传的方式方法，以及下去的注意事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所有的节目进行了重新审定、编排，其中决定实演出的有30多个节目，通过十多天的准备，学校放暑假了，我们的宣传队也出发了。

### 深入广泛宣传“三大运动”

经过废保建政之后，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全

县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大运动(指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向各种反动势力、反动分子、反动会道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像东胜这个国民党各种反动组织的久居之地,社会秩序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平静的。各种顽固的反动分子、暗藏的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最后失败,总是寻找机会进行破坏捣乱。解放初期要清除这些隐患,要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除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之外,还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用革命的道理去发动群众。因此县委决定把宣传队派到农村去,向社会、向广大的农牧民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以便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重点抓好减租反霸,摸清社会情况和阶级状况,为土改做准备。

我们东胜市一完小这个宣传队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些十几岁的娃娃,连我们教师说上也是没经过世面的青年人。至于说搞党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等工作就更是头一回了。我这个宣传队长,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大的责任,但是县委刘书记的话,语重心长,

我全记得。我不仅考虑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更多的还要考虑带上这样一个娃娃队伍的安全问题。临出发时,我们扛着“东胜县委宣传队”的大红旗,25名队员分别乘坐在四辆二饼子马车上,队员们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敲锣打鼓,唱着歌。可是来欢送的家长们三叮五嘱,生怕孩子们出点差错,要求我们注意孩子们的衣食住行,要求我们注意安全,“孩子就交给你们了”。这么一要求,我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了。好在我们的指导员和闫海等同志年龄大一点,又经常在农村搞工作,见过世面,有他们撑腰壮胆,我心里也就宽松了一点。第一天行程30多里,晚上住在二区罕台庙。区上的同志和附近的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接待我们,早已安排好食宿,并对演出的场次、时间、地点,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并已通知了各行政村。第二天在二区二行政村的隆盛兴演出第一场。那个场面真动人,比平常赶庙会还要隆重得多。按通知要求是下午演出,可是中午还不到,四面八方三十、五十里,步行的,骑马、骑毛驴的,坐牛车、马车、骡子车的,就把土戏台(过去神社唱戏的地方)前的平滩坐的满满的,足有一千多

观众，卖饭的、挑货郎担子的小商贩排成了两行临时的街道。二饼子车、牲畜停下半道沟。我们的队员看了此情此景，个个欢欣鼓舞，还没等到演出时间，就提前吃饭，提前演出了。由于我们是到农村第一次第一场演出，又没经验，看见来了这么多的观众，高兴的了不得，就一个劲儿的演出，一个劲儿的宣传。本来准备能演两场的30多个节目，一个下午大约六个多小时就全部演完了。天黑了，区上的同志和广大群众还强烈要求再演两天。可是我们已经没戏了，再加上另一个演出点已发了通知，无奈只好谢绝。

这一场演出后，我们及时地进行了总结，在演出的中间穿插进行口头宣传，每次宣传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主要讲解“二五减租”的内容和方针政策，斗争恶霸、镇压反革命的重大意义，号召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群众听了很受教育。第一场的演出成功，鼓舞了宣传队全体同志的士气，增强了信心。

下一个演出地点安排在二区五行政村的



柴登壕。

说起柴登壕，在东胜县是很有名气的，这里地势四面高，中间低，形成一个小盆地，地势平坦，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在垦牧之前是由巴彦尔公等大牧主主宰这里的一切。清末民初，由陕西等地来这里开荒种地的汉人逐渐增多，牧场变成了农田，牧民西迁了。地主代替了牧主，主宰了这里的一切。他们招揽了大批佃户长工，开荒种地，蓄草屯粮。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由于他们政权的性质所决定，大地主就是政界的头面人物。为了维护其统治剥削地位，进而发展为招兵买马，拉起山头，扩充势力。恶霸地主崔宽子就是柴登壕的土皇帝。解放前在群众中流传着“东胜县，西胜县，崔宽寨子是阎王殿”的谣谚。“9·19”和平解放后，崔宽子畏罪逃跑。后被抓获，于1951年2月22日在东胜城镇压。我们宣传队来这里准备演出两场。第一场演出群众来得也很多。观众看完后，情绪很高。区、村干部和广大群众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一演柴登壕的事，演一演恶霸地主崔宽子剥削压迫农民的事。根据这一要求，经过队委会研究，为了丰富宣传内容，更

好地配合当前的形势任务，搞一些短小的节目也是可行的。决定在休整两天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搞一些文字材料，再编一点小节目。于是把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各组由队委会的成员带领，进行调查访问，拿上列好的调查提纲，主要了解柴登壕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状况。经过一天的个别走访、小会座谈，晚上回来一汇总，素材很多，每个人的汇报，就是一串串故事，很生动。这对我们全体队员启发很大，增长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增强了演柴登壕，演崔宽子剥削压迫农民罪恶等戏的信心，把一大堆零散的材料，用剥削压迫与反剥削压迫的这条主线串起来，重新列出了提纲，决定集体创作一个大型话剧，剧名叫《活捉崔宽子》。并列出了剧中人，分配了角色。根据总提纲的情节、场次，每个角色自己编台词，当晚就开始了行动。休整的第二天，一面继续走访，充实内容，一面编自己的台词，晚上就开始对台词排练，第三天上午预演，下午通知观众，把这个需演4个多小时的六幕大型话剧公开演出了。在整个演出中，观众秩序井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为了现身说法，特意请了崔家的佃

户长工两人也在剧中扮演了佃户长工的角色，当演到召开诉苦大会一场时，台下有不少群众好象也进入了角色，不断地高声大喊：“我要发言！我有话要说！”虽被民兵劝阻了他们上台发言的举动，但群众看到演了他们的事，说了他们心里要说的话，内心激动极了，会场沸腾了。“打倒恶霸！”“坚决镇压反革命！”“紧急行动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自发的口号声一个接着一个，代表了大家的心愿，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呼声。这时台上的演员也变成台下的群众角色了，跟着高呼口号，口号声停了，台上的角色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往下演。演出结束后，干部群众又把我们团团围住，紧紧地握住队员们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演得好，揭露了恶霸地主的罪恶，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给我们长工佃户和广大农民群众撑了腰。”有的说：“在崔宽子盘剥过的地方，演出《活捉崔宽子》，真是大快人心！演了我们的心事，说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保卫人民民主的新政权。”这时我们为了巩固宣传效果，带领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

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歌声又把柴登壕的人民群众带入了欢乐、喜庆、幸福的海洋，人群中又欢腾起来了，说呀！笑呀！唱呀！跳呀……

这个剧的演出，对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同志来说鼓舞太大了，收获也太大了，出乎预料的演出成功，出乎预料的演出效果，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尝试，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尽管我们没有搞过专业文艺工作，可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在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得到了营养。有了群众的实践，发动大家，群策群力，集体创作，虽然艺术表演功夫有欠缺，但政治思想内容、宣传教育的效益却是比较理想的。我们也初步体会到文化艺术的源泉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的道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我们演出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

经过柴登壕两天的休整，使宣传队在宣传内容上、形式上、思想上都得到了充实提高。《活捉崔宽子》这个剧，成为我们配合当前形势，配合当时正在全县进行的“三大运动”最紧密、最现实的一个剧目。走到哪里，演到哪里。

总共演出七场，每演出一场都有改进、都有提高，效果一次比一次好。观看过这个剧的观众约一万人(次)以上。以后有些行政村和区上还要求专门为他们演出此剧，因为当时的任务紧，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次宣传队深入农村历时 35 天，行经三个区十一个行政村八个演出点，共演出 14 场。每个演出点上不仅吸引了东胜的众多观众，毗邻的达拉特、郡王、杭锦等旗的群众也来了不少。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捉了两个大草包》(志愿军捉了两个美国佬)、《财主请客》、蒙古舞、大合唱，还有配合当时“三大运动”的小剧、表演唱、快板以及《活捉崔宽子》等 30 多个节目。口头宣传的材料有县委编审的减租反霸的方针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反革命的有关材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活动和以搞好政权建设、生产建设的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赴朝作战的正义斗争等。我们每次演出结束后，总有不少群众捐献钱物，还有青年人报名当志愿军的，这些我们都交区上办理，我们只给口头表扬，不具体受理。

宣传队每到一处，除了文艺演出，口头宣

讲外，还广泛地接触群众，个别走访，召开座谈会，收集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意见、要求，我们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给县委作了报告。县委将我们反映的问题，还专门通知了有关区、村，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一项任务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每到一处，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向群众教唱歌曲、扭秧歌。到了三区三行政村苏家圪卜演出时，区、村干部组织了几百名群众，让我们给教扭秧歌，我们的队员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和他们一起扭秧歌，队伍里有男的，有女的，有十几岁的娃娃，也有四、五十岁的，锣鼓打起来，人们就乱作一团，有跑的、有跳的、有站着不动的，真是千姿百态，把人们笑得直肚痛。后来由专人给教步伐、教队形，我们的宣传队员给作示范，这样青年人很快就学会了。我们演出结束后，还和我们一起搞联欢，人们扭的、唱的都会了。东胜地区过去没扭秧歌的习惯，只有一种每逢正头半月，乡里办社火时有一种群众自发的“大步流星”，按鼓点走的“跑秧歌”和转灯游会时走的“九曲黄河阵”之类的活动。这次我们所到之处，就把这种大众化文艺活动传给了广大农民，《东方红》等革命

歌曲也随着我们的踪迹，传播在农村的各个角落。

整个演出过程，都是按原来的计划进行的。在这个点上演出，下一个点上在头一天就派车来接了，路过三区四行政村什股壕时，被那里的干部群众拦住了，只好再增加了一个演出点。未能去演出的行政村的一些干部每天都有人来找我们去演出，如果不去就是看不起他们。我们只好耐心解释，好言相劝，答应以后一定补上。我们这个以娃娃为主的宣传队，有的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妈妈，可是这次走了一个多月，个个很有出息，没有一个闹情绪想家的，有说有笑，也没出什么问题，安全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宣传队回到东胜后，还久久地想着群众，群众也想着我们。县委给我们开了个会，口头表扬了我们，称赞我们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前三大运动的顺利进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1951年冬季，学校还未放寒假，即接到县委的通知，为配合东胜一区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宣传队再次深入农村进行宣

传演出工作。这次宣传队的组建,除了原有的人员以外,学生中增加了刘喜英等同学,还有县文化馆组织的一部分民间艺人,如乔玉莲、白生儿、靳三树等人,文化馆干部带的幻灯机等组成东胜县土改宣传队共35人。演出的节目除了原来的那些以外,又赶排了一部分有关土改方面的小戏,如《王贵与李香香》等。这次演出尽量满足上次未走过的行政村的要求,先后走了一区的天漫梁、割蛇壕、灶火壕,二区的色连、鸡蓄沟,三区的漫赖壕、广成永等七个演出点。由于正是数九寒天,风大沙多,到了三区广成永大风刮了三天三夜还不住,搭起台子一风刮倒,白天家里还得点灯照明,演出十分困难,春节也将到来,经请示县委同意后返回东胜。这次宣传有文化馆组织的民间艺人排练的部分传统节目,还有配合宣传土改政策的幻灯片,深受群众的欢迎,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此,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忠亮同志亲笔写了一封表扬信,大意是这样的:“周树云、康振孝二同志及宣传队的全体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天寒地冻,不怕路途遥远,任劳任怨,在不长的时间内,又一次出色地完成



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走遍了东胜县的大部分地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党的政策武装了群众，鼓舞了群众，为即将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大造舆论。人民群众感谢你们！县委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不断做出更大的贡献。”到此为止，宣传队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 建国初期经济发展 情况和几次运动记述

周树云

从1950年3月,我们党接管了素胜县那个千疮百孔的旧摊子算起,到1952年底,和全国一样,为三年恢复时期。

这一时期的工作内容多,任务重,时间要求很紧迫。总的以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诡计,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主要内容开展了以下工作:

## 抗美援朝运动

新中国刚刚诞生,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一向仇视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我国的大门口,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中国人民迅速组成了以彭德怀为

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军。为此，在全国上下层层建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分会。迅速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东胜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在开展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和平签名运动，掀起捐款捐物、报名参加志愿军、写慰问信、做慰问袋的热潮，一批批慰问品送往朝鲜前线，同时以搞好当前正在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努力发展生产来支援前线，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的人民政权建立后，农牧民和地主之间的租佃关系、租籽、股份、高利盘剥等矛盾急待解决。已被推翻的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潜伏下来的特务、土匪、恶霸以及反动会道门和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到处造谣生事，破坏生产，抢劫物资，扰乱社会治安。朝鲜战争暴发后，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

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1950年7月,东胜县成立了减租反霸的专门机构,由县长冯开选、副书记刘忠亮等人组成减租反霸办公室,同时还成立了以冯开选为审判长,李玉鹏为副审判长的减租反霸法庭。10月10日至20日,召开了全县的县、区、村三级干部会和第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20多人,会上专门研究部署了《关于农业税的征收条例和实施细则》,并传达了上级有关开展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的精神。1951年的2月13日至19日,县委主持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这个会上,县委全面研究部署了减租(地主分了佃户的租子将25%退还给佃户)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工作。以上几项工作和其他工作,根据东胜县的具体情况,都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在减租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是实行群众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发动了群众,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使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二是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集中力量

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又愿意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三是领导机关严肃认真，谨慎细致，注意调查和证据，不搞逼供信，贯彻“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又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根据以上精神，东胜县在1951年2月13日至19日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之后，按照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盟公安处、解放军驻军骑五师即派员协助东胜县的干部群众，于1951年的2月上旬，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连夜将全县的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1951年2月22日，在东胜街头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审判了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在公审大会上，来自东胜农村、城镇和邻近各旗的广大群众，控诉了崔宽子为非作歹，剥削欺压群众，以办毛织厂为名侵吞全县人民血汗，解放后又继续与人民为敌的罪行。公审大会后，当即枪决了崔宽子等几名反革命分子。接着在二区阿不亥的板东圪台召开了斗争恶霸撤海洋的大会。县委书记、县长冯开选

在大会上讲了话,进一步宣传了党的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的各项方针政策,号召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为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个安全的后方,为土地改革和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冯县长讲话后,紧接着来自全二区和附近农村、牧区的广大群众纷纷起来诉苦申冤,揭发了恶霸撤海洋依仗反动权势,剥削压迫群众,不择手段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的大量罪行。会场上“打倒恶霸地主撤海洋!清算恶霸地主的罪恶!血债要用血来还!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时干部、民兵、公安人员、解放军战士再三努力想把秩序维持好,可是愤怒的群众起来之后,象洪水决口一样,一下冲向被押上审判台的恶霸撤海洋,冲散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了撤海洋用石头乱打,棍棒乱敲。结果当场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给打死了。真是大快人心,为民申了冤,报了仇,为社会除

了害。这次斗争大会后，县委召集有关人员和各级干部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一定要注意做好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要坚持说理斗争，履行法律程序。从此以后的斗争会尽管也有一些过激的行动，但再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1951年的农历三月初二全县又在三区的桃力庙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东胜西部的群众外，还有来自郡王、杭锦、达拉特等旗的群众，最远的还有来自巴盟后套的部分群众共约2000多人，会议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徐凤翼同志主持，这次会上主要是斗争恶霸地主杨七（又名杨在普）等人。杨七曾是哥老会的红旗老五（是会道门的一个头子）又是东胜县的参议员。除了占有大量土地进行土地和高利贷的剥削外，在政界、军界、商业界都有一定的势力，连他居住的土寨子也是抓老百姓给修的。抗日战争以来，这个寨子附近聚集来几十户从河北省等地来的小商小贩。这些小商贩由于居住在杨七的地盘上，所以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杨七的制约与控制。寨子上建有学校、粮台。杨七自己也经商。经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扶持和苦心经营，这个寨子曾经一度人丁兴旺，商业繁盛，成为东胜县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西胜县”。杨七依仗权势，和其他的恶霸地主一样，不择手段，对农民和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欺男霸女，草菅人命。在那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的日子里，竟亲手害死三条人命却扬长而去，受害者无权无钱，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现在解放了，共产党给人民群众撑腰，人民当家做主，杨七等人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斗争大会开始了，他哪里能想到，站在他面前控诉他的罪恶的正是在他作威作福的日子里，一脚踢死的那个怀孕妇女的儿子云开雷，还有被他霸占为妾的原夫刘金良（佃户）。他哪里能想到，过去的长工、佃户，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过去被他逼得家破人亡，走头无路的云开雷现在已是共产党的一名负责干部！杨七的罪恶在人山人海的群众大会上，一件件，一桩桩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苦受难的穷苦人站起来了，他们控诉那暗无天日吃人遍地的万恶的旧社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



血腥统治,控诉封建地主残无人道的剥削压榨……,斗争会结束后,根据杨七的罪行,依法押赴刑场用刀砍,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这次和杨七一起处决的还有反革命分子杨付财和外地逃亡来东胜的高燕林、薛海泉等三个反革命分子。这一时期,还先后在一区的塔拉壕许家壕村、郝家圪卜、韩家坡等地召开了同样的群众大会,镇压了薛金太、庄润保、张德仁等反革命分子。这个时期还对全县的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进行了清理登记,对其他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也进行了清理登记,对在东胜全县有巨大影响的有道徒达 2278 名的一贯道这个反动会道门,经过登记,宣布依法取缔。从 1950 年的下半年开始至 1951 年的 8 月底,全县进行的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基本上消灭了东胜境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的基本情况全部搞清了。对他们中间除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以外,对绝大多数愿意悔改,重新做人的人都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本着给出路的政策,予以宽大处理。这样做,有利于

分化瓦解敌人,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为抗美援朝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后方,有效地保卫了革命胜利的果实,为全县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作了充分的准备,为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土地改革运动

三年恢复时期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东胜和全国一样,旧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土地。农民忍受着各种地租、苛捐杂税、徭役、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况不改变,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即未达到胜利果实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为此,东胜县根据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有关文件精神。于1951年的9月底开始在全县分两批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了全面准确

地贯彻关于土地改革中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路线，首先培训了大批干部，于1951年的秋天，组成了以白汉臣同志(抽调的乌审旗委书记)任团长的土改工作团，首先在一区二行政村(羊场壕)展开了土改试点工作。接着在一区、二区开展了第一批土地改革。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在三区、四区进行了第二批土改。至此，全县土地改革结束。1952年的下半年到1953年的上半年又抽调了大批干部，也是分两批，在一二区和三四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人均均为353亩，富农人均90亩，中农人均35亩，贫农人均20亩，雇农人均5亩。土地改革中没收了地主的土地706882亩，征收各项土地188454亩。将以上这两种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后，雇农人均占有土地37亩，贫农人均40亩，中农人均43亩，富农人均53亩，地主人均36亩。由于认真贯彻了有领导地发动群众的方针，由盟、县、区、村各级干部组成了土改团、队、组的组织领导，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逐步把

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骨干和执行机关。在发动贫苦农民的基础上，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工作。在划分成份时，在农民内部（主要指贫、雇、中农）充分发扬民主，采取了自报公议的办法，允许个人自报和反复争辩。由群众审议评定。最后由村政府报请区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在划分阶级，分清敌我后，对地主阶级的剥削罪行，则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开展面对面的揭发和清算，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和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捣乱的分子，绝大部分在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已经受到应有的惩处，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县斗争了地主216人；同时结合镇反运动又捕获特务2人，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8人。在土改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就着手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等五大财产，征收了在东胜境内的阿不亥庙、罕台庙、哈拉不拉庙、丰盛寺（马莲圪卜大庙）、桃力庙、吉劳庆庙等庙宇的土地。将这些没收的财产、土地和征收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和生产资料缺乏的农民。土地和被没收的财产分配是以行政村为单位，按人口统一分配的。土地的分配则是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按土地的数量、质量、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的办法进行分配，经过反复核对无误后，发给土地证。通过分配土地，有的行政村土地较多，按人口分配后，拿出一部分作为公有土地，由农会管理，当时叫农会地。以行政村为单位，在土地改革将要结束时，工作队帮助建立了党团组织，妇女、民兵、治保等组织，整顿了村政权、农会等组织。帮助拟定生产计划，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每个村土改结束时都要开庆功会。我那时虽在学校教书，可是带领学生参加了好几个地方的庆功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区一行政村的庆功会上，农民自己做了很多小红旗，有布的、有纸的。早上太阳没出头就赶到会场了，那个热闹劲超过了赶庙会、看大戏多少倍，当雇农王二虎、王牛换等人领到了土地证后，手抚摸着土地证，裂着大嘴笑，眼里却流着泪，站在主席台前一动不动，站着，想着，眼泪流着，站了很久很久，好像一下子猛醒过了，举起了双手，把土地证举得高高的，高声大喊：“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过了春节开学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于1952年的3月7日，我由东胜一完小调到三区自生堡小学当校长，这时三区的土改也即将结束，我们又带领学生参加了三区一行政村的庆功大会。庆功会的一项主要议程是发土地证，当翻身农民的手里拿到了土地证后，那个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有说的，有笑的，有蹦的，有跳的，还有激动得两眼流泪说不出话来的。大会议程进行到最后一项时，冯开选县长讲了话，他郑重宣告，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彻底打倒了封建统治势力，广大贫苦农民从此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他的讲话不时地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所打断。接着各自然村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整整齐齐地排成队，扛着自己做的小红旗，敲锣打鼓，进行了游行示威，我们的教师、学生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面。浩浩荡荡的农民队伍足有二里多长，围着杨米子圪旦绕大圈，充分显示了翻身农民的威风，表示对土地改革运动伟大胜利的庆贺。队伍里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有的喊统

一规定的口号,也有喊随时自编口号的,但是千言万语归结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土地改革是解放农村生产力,使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条件。建国后在新解放区的土改,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目的就是为早日恢复农村生产,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所以这次土改不动富农、不挖底财、不分浮财,使土地改革稳步前进,取得了伟大胜利,这对我们的三年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各项运动,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从1950年开始全国对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工作。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就当时的东胜来说,主要是对工商业加强党的领导,积极整顿恢复,鼓励发展,同时进行合理的调整。清末民初以来兴盛于东胜的一些坐地户的买卖商号有10多家,如丰盛西、玉成泉、广生成、隆盛兴、九成功、万盛奎、广成永等,在解放前夕大部分关闭、停业了。农村只有56个油坊和1948年解放区派阮培明等人来和一区旧庙沟的麻富其合股开设了一

座流酒的小缸坊(解放前还有几处流酒的小作坊早已停业了)。东胜城内有大小商业百货店铺 17 家,饮食服务业 18 家,小手工业者 9 家,共计 44 家。这就是解放初期东胜全县工商业的全部情况。当然农村还有铁匠、木匠、铜匠、银匠、皮匠、毡匠、毛毛匠等小手工业者。至于农村的商品流通,主要通过分布在东胜的桃力庙、山炭庙、板尔色太庙、罕台庙、吉乐庆庙、阿不亥庙、哈拉不拉庙,每年有一两次庙会跳鬼和分布在农村各地的龙王庙每年五月廿五日、十月初一两次神社唱戏,还有关公庙五月十三日,观音庙二月十九日固定日期的神社唱戏。这些庙会跳鬼,神社唱戏大部分是两三天的会期,最长的有桃力庙会期达一月之久。庙会期间便是农村的集市贸易场所。城乡小商小贩,远道从包头、陕西榆林、神木、府谷、山西保德等地来的客商交易,农牧民拿上自己的农牧副土特产品换取布匹、水烟、糖、茶等生产生活日用品。平时还有一些小商小贩货郎子等临时性的经商活动,他们来往于东胜城乡,搞一些小本生意。在整顿调整工商业的同时,1950 年还接收了粮食部门(国民党时期粮台),成立了



盟、县粮食局。盟、县成立了国营商业贸易公司。组建了供销合作社。这些国营经济部门的成立和组建,再加上合理的调整了私营工商业,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私营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得其所,既利用了私营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因素,又限制了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因素。把东胜为数甚少的一些小本生意的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从而使东胜街头的 44 户工商业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生意十分兴隆。到 1952 年大约发展到近一百户,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社会商品充足,货畅其流。各区分别建立了供销合作社的基层社。个别行政村也建立了供销点。大大方便了群众。

1950 年的 12 月,党中央发出了必须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即三反运动),东胜县于 1951 年底至 1952 年初,在县级机关开展了“三反”运动。根据毛主席在 1951 年 12 月 8 日提出的:“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

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的指示，县级机关在所有职工，包括学校的教职工中都进行了动员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带头检举揭发，带头作自我检查，自我批评。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经过干部群众的检举揭发，对那些有一般问题的人，让其深刻检查，承认错误，组织上进行了批评教育。如有一名负责干部本人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老婆瞒着丈夫从老区往这里走时，带了10两多大烟，没有交待。这个干部在大会小会上检查了多次，群众就是不让，最后，有人继续检举揭发，曾发现他女人私藏烟土的行为，在搬家时带了一点私货。这样一提这个干部晚上回去就动员女人交待，女人当时一口咬定不知道。这个干部说：“你要我，就把东西交出来，要东西，不要我，我就自动投案，明天我就自己进监狱。”这样老婆哭着把东西交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会议一开始，大家让他继续交待问题，这个干部把十两多大烟

原封不动地往桌上一放说：“这就是我应交待的问题。”广大群众认为他态度诚恳，交待得好，都很满意地谅解了他，他本人也轻装上阵了。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积极主动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的同志把因私事，用了公家的几张信纸、两个信封也检查到这是占公家便宜的行为。对一些人的问题比较严重，但主动坦白交待，认错态度好的给予宽大处理。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在大量事实面前，仍有极少数人即当时说的顽固分子，不坦白、不交待、不认错，态度不好，分别给予从严惩处。如当时县财政科长，被打成老虎的（贪占 1000 元以上即为老虎）郝虎文（起义人员）给予判刑劳改的处理。各级领导干部在“三反”运动中还认真地检查了官僚主义等错误。

关于“五反”运动，在这个没有大的企业和大的工商户的东胜来说，主要是根据全国的精神，在有关人员和全体干部群众中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学习讨论。到 1952 年夏天，“三反”、“五反”运动即告结束。通过这些运动，进一步牢固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社会

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建立了工人群众对私营工商企业、工商业户的监督与管理,把私营工商业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广大干部群众也是一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混乱局面。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各项社会改革的促进下,全县经济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农村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城市的工商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项经济工作、经济建设开始起步。到1952年,全县的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73.93万元,增加到292.58万元,增长168.2%。牲畜头数由1949年的50859头(只)增加到123969头(只),增长243.8%。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5.64万元增长到32.53万元,增长576.8%。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949年的22万元增长到152万元,增长690%。与此同时,全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学校由1949年的4所增长到16所(其中

1952年接收了民办小学12所为公办学校)。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234人增长到596人,教学班由1949年的11个增到24个,教职工由1949年的11人增长到30人。卫生事业也发展很快,卫生院由1949年的1处增长到2处,病床从无到有发展到10张,医务人员由1949年的11人增长到23人。其他文化、体育事业也有了积极的发展,各种文艺队、秧歌队、扫盲班、速成识字班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局面。解放三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英勇奋斗,不断前进,终于完成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必要的条件。

# 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

周树云

## 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化之路

土地改革在全县的胜利完成，结束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历史。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废除了苛捐杂税、应差、抓丁、要粮要草的盘剥。农村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被空前的调动起来了。当时的宣传口径是：摆在农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放任自流，各显神通，让农民自由地发展生产，走过去的老路；一条是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土地改革后的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土地条件差、生产条件落后，耕畜、农具短缺。再加上在封建地主及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剥削，兵荒马乱的环境下，广大农民在水深火热中挣

扎，生活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的生产生活要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改善，就只有听共产党的话，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个体农民，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为了抗拒天灾人祸，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土地和出卖土地，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逐步采用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农业技术，确实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工农联盟的巩固，国家对农产品日益需要的增大，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的技术改造也日益增强，这也是当时促进一些个体农民向互助合作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鉴于上述情况，党中央于1951年9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来又把这个决议草案作了部分修改，于1953年2月15日，以正式决议向全国公布。决议根据土改后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1952年全县完

成土地改革之后,由于贯彻了全国第一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精神,全县就有了 3156 人组织起 443 个互助组,占农村人口的 10%左右。全县培养了张万忠、高明生、张来成、张长锁等 14 个常年互助组。到 1953 年完成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接着召开了东胜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研究了土改后的农村建设和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年结合普选将全县的 18 个行政村改建为 18 个乡人民政府,原城关镇街公所改建成乡级镇人民政府,并健全了乡人民政府下设的民政、生产建设、财政、文教、治安保卫五个委员会和乡民兵队队部,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政权的建设。

1953 年,全县开展了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本年在完成各项社会改革和贯彻婚姻法的同时,集中主要精力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 1952 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县 3.4 万多农村人口中有 3365 户 11214 人参加到 440 多个互助组内。其中有 34 个长年互



助组。全县将近三分之一的个体农民加入了互助合作的行列。这种互助合作运动,首先是由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带头搞起来的。

### 样板社之一——“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区三乡察干村张家渠在共产党员张三全的带领下,于1952年办起了互助组,参加这个组的除张三全同志外还有张万忠,张万余,张发厚,张成亮,王虎生,张仁留共7户28人,他们都是贫雇农。当时由于张三全担任村里的农会组长、民兵队长等职,所以互助组选张万忠当了组长。这7户中有两户是单身汉,顾了家里,顾不了地里。其他五户不是没牛,就是没犁,虽然分到了土地,也难开张生产。这时下乡干部走村串户宣传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们听了正合心意,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用他们的话来说:“真是手支磨扇,急等着哩。”这样中农看,贫雇农干,牛工变人工,人工换牛工,人工换人工,谁有困难大家帮,谁有紧活大家干。有牛没犁,有犁没牛的合伙起来配套了。有人生了病,地也种好了。夏天锄地的人手多,进展快,比单干户提前锄完了。秋天收割也提前完

成了。这一年下来，互助组获得了好收成。七户人家笑逐颜开，逢人就说：“共产党领导真正好，给我们指出了光明道，组织起来力量大，什么困难也不怕。”由于互助组战胜了困难，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产条件，初步显示了优越性。上级领导好容易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当成了一个典型抓住不放，盟委副书记、副盟长李振华，秘书长赵金山，财政处长闫耀先，县委书记、县长耿如章，副县长徐凤翼，公安局长李玉鹏（后提为副书记），一区区长郝开泉，副区长康德功、郝成祖等同志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们带着宣传总路线，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任务，和这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及时总结经验，商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3年，即在这个互助组的基础上建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名就叫“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东胜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的互助组长张万忠当了社长。这七户人家没有一个识字人，只好请活沙兔沟的王二虎这个粗通文字的人来当了会计。这样，这个合作社就由八户人家34口人组成。全社共有6

条牛,三个二饼子车,三张犁,两支耩,20只羊,每户房前屋后有三、五苗树,这就是全部生产资料。这一年,党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指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各级农村工作干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根据这个精神,各级领导把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工作看作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广大农民中广泛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民还以为是要大家组织起来做买卖的,东打听,西问讯,都觉得很希奇。后来,经下乡的盟、县、区各级干部反复宣传解释,又派来了郝成祖等同志为驻社干部,专门帮助社里工作,群众这才知道合作社是做什么的。原来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没有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合作社就不同了,它是在部分废除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土地、牲畜、大型农具都要入股,劳动力参加劳动要

记工评分。通过反复的宣传解释，农民才逐步明确了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八户农民坚定了办合作社的信心。在驻社干部的帮助下制定了发展生产的计划，合作社的章程及秋天的分配方案。这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了，提留公积金3%，公益金1%，付清了耕畜、农具的股红，下余70%的收入按劳动工分分配，30%按土地股份分配。每个劳动日（10分工）分值是0.32元，粮食按人头分配。这是农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由个体农民走向集体的一个开端。“五三社”丰收了，社员分到了粮，分到了票子，这下远近出了名。家家户户种了不少树，还发展了两亩水地，这也是张家渠第一次有了水地，买了一部畜拉水车。为了资助初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扶持这个新生事物，秋天县里给拨款买了两匹耕马。办社第一年，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鼓舞了翻身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也吸引了附近农民特别是吸引了中农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性。张家渠的张交成、张爱羊两户中农，观望了七户人家的互助组一年，又观

望了八户农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这二年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生产都比他们单干强，便主动申请参加合作社，经社员大会讨论，一致同意吸收了他们，1954年“五三社”就成了10户人家，共50口人的合作社了。耕马增加到四匹，耕牛8条，二饼子车发展到6辆，犁6张，耩4支，水地发展到6亩，每户平均有一亩多树，羊发展到200多只。到1954年，“五三社”越办越红火了，农林牧全面发展，抽出部分劳力和车辆跑运输和干其他事业，合作社全面规划发展生产的计划，统一安排农林牧副业生产，合理调配男女劳力，除了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外，还可支援国家建设，搞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如运输等。集体经济的家底又有所壮大，生产发展的步伐加快了。合作社社员生活的改善远远超过了个体农民的速度。这一年“五三社”的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0.4元，每个整劳力分到现款100多元，有不少单干户这一年没有现款收入。

东胜县在1953年第一批就办了八个户人家的合作社。各级干部，社干部和驻社干部，

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以及要求各级农村干部，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的精神，在干中学，学中干，及时总结经验，及时通报推广，这样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增长了各级领导的才干。这八户农民的尝试，给全县农民做出了样子。

1954年的3月30日至4月4日东胜县召开了全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除了工作报告，学习贯彻总路线外，全县代表还集中讨论了农村工作和农业互助合作的问题。在党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全县农民学习了“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未建立互助组的积极组建互助组。没有参加互助组的要求参加互助组。互助组办得好的，要求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当年全县又办起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有57户，338人。互助组发展到586个，参加农民3415户17075人。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占全县35996

名农民的近 48%，其中有长年互助组 136 个。

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头几年尤其注意了以下几项工作：①及时批判错误思想，总结经验，加以推广。②在农民中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党的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③按区、乡、村拟定规划。④用会议或短期训练办法培训办社干部。⑤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尽可能促进互助组之间的联合，打好建立合作社的基础。通过以上工作，既解决了农业合作化的质量问题，也解决了互助组、合作社发展的速度问题。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既注意互助组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又注意了每年抽出干部进行整顿工作。在建组、建社和整组、整社工作中，都是以乡、社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放手让他们去做，以上面派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只起指导作用。这里应说明的就是驻社干部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由于这些原因，“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东胜全县的互助合作运动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了全县出经验，出干部的地方。到 1955 年，“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18

户,96人,到1956年,根据上级的小社并大社的精神,一区三乡的全乡除地主、富农和个别还暂时不想入社的中农以外,全乡有410多户农民2000多口人全部加入了“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又是全县第一个以乡建社的典型。其中这个乡前二年办起的郝家壕的五四社,板洞梁的先锋社等几个小社也一起并入大社,统称五三大社,下面分了6个大队,约30个小队,生产上由全社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以大队指挥领导生产,以生产队为具体的生产劳动单位。全大社实行了土地入社,劳力评底分,大农具、耕畜作价入社,作为股份基金和生产费用,以劳力均摊。股份基金以劳动力底分带入,生产费一次性带入社内。这两种基金多的记在帐上,逐年归还。不足的从每年的劳动收入中逐年扣回。这就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所以“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八户农民起家,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发展成为410多户全乡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全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个缩影。到



1955年,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3个,入社农民592户,计2960人,占全县37543人的7.89%。互助组下降到504个,互助组的农民有3487户,17435人。到1956年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89个,其中有高级农业社50个,入社农民7106户,占全县7376农户的96.2%,入社农民36128人,占全县农民37636人的95.9%。这个发展速度是全国、全区、全盟合作化高潮的产物,为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条件。

### 样板社之二——“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

东胜县从1953年出现的第一个八户农民创办的农业合作社起,经过一年的实践,给全县农民做出了样子,到1954年,就发展到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分布在各个区里,使各区都有了自己的典型。三区五乡的陈家村,在贫农、共产党员高明生的带领下,在互助组基础上,于1954年创办了一个有28户、82人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继一区三乡五三社之后的又一个样板合作社,故起名为“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陈家村地处泊尔江海子,地势

平坦，土质较好，土改后的第一年即1952年就办起了季节性的变工组、互助组，开始迈出了互助合作的第一步。1953年成为常年互助组。1954年建社时，这28户人家只有6条耕牛，2头骡子，6辆二饼子车，5张老犁、5支耩，其中有两户养羊的也只有120多只，全社没有一亩水地，没有一苗树，吃水还得去二里以外的地方去担，或驮、拉。这里生产条件差，耕作落后，经营粗放，大部分是解放前来的“跑青牛犊”，土地虽好，没有养成精耕细作的习惯。另外，当时由于人少地多，荒地多耕地少，未开发的土地不是碱滩，就是草滩，耕作一亩滩地、壕地，要比耕作5亩梁地、沙地还费工费力，再加耕畜、农具等生产工具短缺，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靠个体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改变生产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困难经过互助组二年的实践，有了不少的改变，初步体现了组织起来，靠集体力量改变生产条件，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优越性。有些困难也能克服。但是几户没有参加互助组的个体农民，对互助合作持着观望态度，想等一等。

看一看再说。结果在二年实践中,在同样的土地上,互助组的地种好了,丰收了,他们却没打下多少粮,有的根本就种不上,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卖了耕畜;有的卖了农具;还有两户迁移到他乡去了。土地改革后仅仅两年的时间,农村就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变化,也是给翻身后的农民提出了选择走什么道路的关键时刻。高明生等贫雇农坚决选择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当时高明生提出:“要想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要想消除农村的两极分化,只有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愿意跟我干的,咱们一起干,互助组能克服困难,能增产增收,可是组织起来,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更能发挥集体化的优越性,只要我们自己努力,只要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就这样,在互助组尝试了二年的28户农民一致同意办合作社,选高明生当了社长,“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了。按照当时观点,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组又前进了一

步。

当时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的一件大事情，是千百年来传统耕作习惯、经营方式的大变革。这种变革又给广大农民的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新的制度，新的组织，新的耕作方法，新的经营管理形式，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只要党和政府一声令下，群众就坚决响应。只要社干部提出合理的意见，大家就都能跟着干。说到哪，听到哪，指到哪里，干到哪里。从建社的第一年开始，社里就统一进行了规划，就开始了兴修水利。首先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家家户户开始了植树造林，社长高明生去东胜、伊旗等地远道买回树苗分给大家种。这里天然牧场也很好，政府号召发展畜牧业，每家每户开始养起了牛马羊。队里统一组织车辆、劳力去外面搞运输。农业生产的耕作方法主要将原来的粗放经营，改变成耕、滚、耙、耨（主要适用于滩地、壕地）。第一年收成很好，每人分粮 400 多斤，每个劳动日分红 0.5 元多，还给国家卖了不少粮。农业生产合作社使陈家村变了样。“五四社”的增产增

收轰动了左邻右舍。陈家村的群众欢天喜地。社长高明生出席了县、盟、内蒙召开的先代会。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奖励。这样一来，“五四社”就更有了吸引力。本村未入社的群众，附近康家村、苏家村、窑院的群众都被牵动起来了，原来想等一等的，再也等不住了，想看一看的，也看清楚了，于是在1955年扩社时，又接收了一部分强烈要求入社的群众，使“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2户，206人。于1955年在上级的帮助下，就办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扩大了，生产资料也增加了，耕畜发展到50多头（匹），二饼子车发展到40多辆，水地从无到有，发展到150多亩，人均达到0.7亩，各村的村院基本上绿化了。畜牧业发展到1000多头（只），这一年是办高级社的第一年，又是个丰收年，给国家卖了各种粮食、油料206石（每石约300斤上下），其中糜子30石，谷子22石，莜麦71石，荞麦63石，豌豆10石，油料10石。户均向国家的贡献4.9石，人均1石，每个劳动日分红将近一元。“五四社”的实践告诉人们：土改后，有些贫雇农确

有走合作化道路的愿望。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这是当时办好合作社的阶级路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办好合作社的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政治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因此，从互助组到办初级社，从初级社到办高级社，这种斗争始终存在。乡、区、县、盟的各级领导，始终注意了这种斗争。当时盟里干部有副盟长马富纲、金汉文，秘书长闫耀先，县委书记、县长乔正秀，副县长徐凤翼，宣传部长郭治祥，驻社干部高俊杰，区委副书记赵宗智、刘占仁、副区长苏汉文等一大批办社干部在这里常来常往，和这里的干部一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总结推广办社经验和经营管理经验，推广农业技术和新式农具。还帮助社干部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多的工作还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自私自利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当时作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思想和政治的保证。“五四农业

生产合作社”就是在这样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下,才办起来并越办越大的。从1954年建社到1955年及以后几年内,每年都受到上级的表扬奖励。1954年盟里奖了圆盘耙,1955年内蒙奖了双轮双铧犁、播种机各一台,还奖了收音机一部,这一年县里还给买了一部收音机。奖励的小农具,奖状年年有。这一时期“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是东胜三区出了名的先进生产合作社,而且在全县、全盟,乃至内蒙也是出了名的。

### 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1953年的冬天开始,东胜全县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以学习、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中心的高潮。农村、城镇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积极向前发展,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即个体工商业)也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1955年县委为了贯彻好中央和上级党委

的指示精神,于3月份召开了东胜县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7月份召开全县的区委书记、乡支部书记,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联席会议;8月份又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巩固问题以及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会议之后,县里抽调干部进行短期训练,每人一份《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及有关文件,深入农村开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工作和整社建社工作。那时我在县文化馆当馆长,县委为了集中使用宣传力量,就把文化馆的同志编为一个流动宣传组,宣传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县委关于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部署。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我们这个组由丁峨山、王治国和我三个人组成,带了一部三用收音机(借县中苏友好协会的),一部幻灯机,一个留声机,自编了一些宣传材料,自制了一部分幻灯片走遍了全县的各区、乡、社。以1955年新建的37个农业社和原有的6个农业社为重



点,一个不漏地全部去过。每到一处,都先和那里的区、乡干部与下乡干部取得联系,让他们介绍情况,交待宣传任务。我们带的这三件宣传工具,在当时来说,就是最先进的了,走到哪里,充分利用收音机、幻灯机(群众叫土电影)宣传当天的新闻、苏联的集体农庄、全国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经验。还放映自制的宣传合作化的幻灯片,口头讲解农业合作化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县委的安排部署。每天晚上——干就是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要收抄中央台的记录新闻,一些重要新闻还要及时翻印送给附近下乡的县、区、乡领导干部,便于他们及时地了解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正确地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那一时期,我们三个人白天坐上二饼子马车赶路,晚上到了宣传点上吃饭前,就得做好晚间宣传的准备工作,先把大喇叭架起播放音乐和通知人,再点汽灯,架天线,挂银幕,一切准备就绪才能吃晚饭,一边吃饭一边等人,大约每天晚上九点多十点钟人到齐才开始宣传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也出过几次笑话,造成工作上的失误。有一次到了三区

二乡的折家梁，晚上人已到齐，三用收音机出了毛病。播音放不出去了，要看幻灯、听广播的人等下好几百，急得我们几个人团团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懂修收音机，无奈我们就打开收音机的后盖乱捅古。结果弄的连了线，把电子管全烧了。给群众作了解释，然后就用口头宣传，口头解释幻灯片来弥补。事后县委还让我们做了几次检查，批评了我们不懂技术乱捅古的错误。还有一次到了三区六乡爱国社，也是通知来了好几百人，汽灯罩只有一个了，点过以后不要弄坏，还能继续用，结果房东的四媳妇看着稀奇，用手一握全坏了。这次又没有搞好，幻灯也没映成，只是播放了音乐新闻，进行了口头宣讲。那时县委的领导很重视宣传工作，抓住我们这个“现代化”的三人宣传组始终不放。县委宣传部长郭治祥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有时他也利用大喇叭进行宣讲，他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我们，就听取汇报，研究宣传方法，及时地给我们布置任务，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县委书记、县长乔正秀，副县长徐凤翼也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争着让我们去他们下乡的

地方去宣传。尤其是1955年的上半年，县委把我们这个三人宣传组当成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不仅宣传了农业合作的有关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精神，以及合作化运动中的新人、新事、新典型、新思想，更重要的是配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除了宣传任务外，县委还给了我们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先后在三区六乡的爱国社，五乡的红光社、五四社，二乡的折家梁社，二区二乡的光明社、华业社、常青社，一区三乡的五三社，一乡的五星社等十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班子、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等方面进行过整顿。

我们这个三人宣传组，带的这三件宣传工具，在当时称得上现代化了。就收音机来说，全县是有数的几个，1953年县委给每个区配备了一台收音机，叫区委收音站，活动范围只在区上，全县四个区四个收音机，我们这个流动宣传组，深入到农村，大部分农民是第一次见到收音机，宣传的效果自然是很好的，再加上

我们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工作,宣传效果超过了各区的收音站,县委宣传部长郭治祥在给县委汇报宣传工作时,热情地赞扬我们这个三人宣传组,他说:“三个机器,三个人,村村社社有声音。”的确,我们走遍了全县各乡各社,我们的宣传吸引了广大农民群众,启发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各级领导干部也体验到甜头,因此广大群众,各级干部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干部纷纷要求买收音机。为了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县委、县政府统一购买了一批“长江牌”收音机,给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赠送了一台。1955年的夏天,全县的收音机一次就增加了43台,加上四个区四台,五四社内蒙奖的一台,县中苏友好协会一台,全县的收音机发展到49台。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了自已的收音机。文化馆及时培训了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音员,农民如获至宝,晚上会前会后听,重要新闻组织听,下地劳动在地头听。农民高兴地说:“高山上打钟声音大,顺风耳(指收音机)传来了毛主席的话,共产党指出了光明道,一心一意搞

合作化”。1955年的春天，县委抽调了县级机关的大批干部和区、乡干部共计250多人，统一编成工作队、组，以区是工作队，以乡是工作组。全县开展了整社、整组、扩社、建社工作，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向前发展，广大农民的办社热情也逐渐高涨。秋后，全县43个农业社90%增产增收，合作社社员有80%增加了收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00%的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县合作化运动坚持了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办法，即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与常年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种形式的步骤进行的。这时的合作化运动还是比较稳妥的，看不出什么大问题来。

1955年的下半年，是东胜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大转折。这是由于党中央在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委（扩大）会议上，对于所谓右倾保守错误的批判又升级了。将一些不同意大发

展合作社的同志指责为“小脚女人”，对于当时反映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实际状况的同志，指责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这些批判，不仅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而且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倾思潮，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原来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这一转折，仅仅是半年的时间，上半年还是稳步发展，到了下半年从上到下，都变成了加快发展，大量发展的呼声。一面加快发展，一面又不断批判声讨右倾保守错误，这样一来，有的地方连互助组还没办好，就不顾一切地强行搞大发展了。

当时东胜县文化馆有九名干部，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一部分继续在农村进行流动宣传，一部分在城内搞阵地活动，宣传总路线，抽出三个人编入全县的整社、建社工作队。总之，全力以赴为党的总路线服务。我被抽出编入城关镇工作队，那时城郊有 200 多户农民属城关镇管辖，所以我们这个工作队既有城镇工作，又有农村工作。城关镇于 1954 年底升为区一级的

镇，党委书记张俊玉，副书记赵文海，副镇长白润田。工作队队长由张俊玉兼任，副队长由我和赵文海、白润田担任。我们几个人的分工是：张俊玉管全面，我和赵文海管农村，还有魏有荣等几名下乡干部也都在农村，白润田管城镇。1955年的上半年，城郊还没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南门、圪堵一带互助组还办的可以，正准备建社。其他如碾盘梁、宋家渠、柴家梁、陈家梁、陈家渠、东西沙渠这些地方的互助组还不太巩固。秋收期间，一面抓三秋工作，一面加强宣传动员，准备建社。秋收一结束，就组织农民学习农业合作化的有关文件，以及后来中央发的“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动员，在一部分贫下中农的带动下，即开始初级社的搭架子工作。到1955年12月底，涌现出了一批办农业社的积极分子，如武红罗、郭才、刘保则、陈过海、孙来喜、柴文英、杜锁、屈四、王开和、尚福、张有世、郭玉明、杨来福等等。这些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积极分子，经过学习讨论，主张走合作化的道路，在他们的带动下，又有一部分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

来,要求参加合作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与情况,决定在城郊先办六个合作社,每社十户八户,还有二十多户的。这时,上级又有了新的要求:办大社、办高级社,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这样,原来办六个初级社的方案只好作废。又重新开始做宣传动员工作。办社本来就是先办初级社,再办高级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农民连互助组也没有参加,就要求办高级社,思想上没有一点准备。在动员参加初级社时,就有一部分农民不愿参加,想先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如东沙渠的杜望云、杨五锁、王全仁,还有碾盘梁沟的孙来喜,孙四等人,土改后,他们为了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贷款打井,雇人整地,每户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水地、有的二、三亩,有的四、五亩。还有外地迁移来的屈德甫在碾盘梁沟买了几亩地,贷款打井修出二亩多水地。这部分农户,看着东胜城市建设的飞快发展,他们也看准了开发水地、种植蔬菜是有利可图的发展方向,有的户子动手早,已开始受益,蔬菜收入高出了农业收入的好几倍。有的户子动手晚,打好井



修出地还没受多少益。这些人的入社工作就较难作。他们要求晚入几年，等把贷款还清再入社。肩负神圣的压倒一切任务的建社干部当然也很作难，只能一股劲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动员。为了使他们早日入社，还答应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如贷款可转入社内由社内归还等等。虽然总的要求是“入社自愿”，“不能强迫命令”。但又“不能放任自流”。在此精神指导下，办社干部们对那些坚持不愿入社的农民均视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只能对他们进行多次地开会、反复宣传学习、个别谈话，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直至使他们对办社有了认识。

1956年的元旦之后至春节以前的这段时间，主要做了办大社、办高级社的工作，经过反复的工作，在办社积极分子、党团员的带动下，在原来六个社架子的基础上，改变为以城为界，城南的东、西沙渠，南门圪堵，柴家梁为一个社。城北的宋家渠、陈家渠、陈家梁、碾盘梁沟、苏家渠为一个社。每个社都是100多户，这两个社也只是搭起个架子，具体工作，具体的

入社程序,都没有进行,因春节已到放假了。

过了春节以后,正月初八又接着进行建社入社的具体工作,正当进行入社登记,组织三评(耕畜、农具、劳力底分)的过程中,县委又要求城郊的合作化运动要加快步伐,给全县做出个样子来。这又是第三次方案了,这个方案要求城郊办成一个大社,即将春节前办两个大社的方案改为城关镇所管辖的 200 多户农民办成一个大社。在讨论的过程中,三评工作也告结束。这才开始了建社、入社的具体工作。合作社的名称开始叫“城郊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经过县委的研究和干部讨论,起名叫“永丰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共分十二个生产队。1955 年秋城郊还都是个体农民,到 1956 年的 2 月底,即完成了城郊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东胜城郊的这种“高速度”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代表了全县绝大部分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情况。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经过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这种逐步过渡的过程。所以不少农民思想并没搞通。但由于当时办社的方法过快过急,工作生硬过粗,

形式过于简单,给部分农民以精神和思想压力。尤其是对一部分中农和在土改后生产发展较快的一部分农民,他们虽然在那个高速度的浪潮中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是出于被迫无奈,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给以后的农村工作在较长时间内留下了难以解决而又非解决不可的复杂问题。1955年第三季度以前全县入社农民占到农民总数的只有7.89%,而以后的一个冬春就增加到95.9%。高级农业社由1955年的1个,发展到1956年的50个,占农业社总数的56.2%。100户以上的大社也相继出现。如一区的五三社,城关的永丰社,二区的联丰社,五六联合社等等。到1957年,全县的91个农业社,全部转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与此同时,全县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快了步伐。到1956年的上半年全县的建筑业、煤炭业、运输业、机械业、铁业、铸造业、车辆五金、陶瓷、鞋业等各项手工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合作化。有的建立了社,有的是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也实行

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为了庆祝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成果和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1957年的元旦，东胜城乡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这次演出是由县文教局和文化馆组织的，活动的内容有宣传“一化三改”内容的，有宣传工农牧业文化教育卫生战线的好人好事和各行各业的建设成就的。活动的形式有秧歌队、腰鼓队、戏剧、表演唱、电影等等，宣传队伍有城郊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艺队，一区、二区、三区的文艺宣传队，城内各学校、机关、街道文艺宣传队，总共三个晚上，在东胜街头共有五个活动点，东、西、南、北门各为一个点，市中心的十字街为一个点，每天晚上各家各户门前挂灯笼，堆旺火，文艺演出开始，爆竹齐放，东胜小城热闹非凡，全城灯火通明，十里八乡来的观众挤满了大街小巷。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文艺节目和口头宣传，更增加了几分热闹的气氛。这次庆祝会的规模、内容、形式可以说是东胜街头的第一次。远远超过了平时过年过节的红火热闹。

1956年的上半年，根据全县“一化三改”

的进展情况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县委对全县的行政区划,基层组织,及时地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小乡,归并为 12 个大乡。根据盟委、行署的决定,将临近各旗与东胜的区域进行了调整,这就形成了东胜现在的区域规模。这一年的 6 月 5 日,东胜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各项任务和 12 年经济建设规划的设想。为全县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尽管在完成三大改造的过程中出过一些毛病,如违背客观规律,生搬硬行、强迫命令,过快、过急,公私合营的面宽,改组过多,形式单一,工作不细,伤害了不少人的实际利益和积极性等问题。按原计划提前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但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我国当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成功的,当时的出发点还是正确的。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中所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大创举。

# 风味殊异的梁外饮食

何知文

从自然环境与地理人文条件看,伊盟梁外地区的很多地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既宜农,亦宜牧的。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还是以养牧为主更为适宜。鄂尔多斯高原梁外地区东胜,早年间原本是一块极好的牧场,因为土质好,放垦早,召来的游民日渐增多,变的人稠地窄了。牧业被迫退避,农业占了主位。变成了以农为主,以牧为辅。

由于特殊的土壤所决定,梁外地区的农作物以糜子、谷子、荞麦、黍子、山药(马铃薯)为大宗。麻子、胡麻、高粱、玉米、豆类也种一些,但为数甚少。玉米是为了夏秋季啃青煮玉米棒子吃的。高粱、豆类则主要是作为牲口饲料而用的。

以东胜地区为例,糜子、谷子、荞麦、黍子、山药(马铃薯),号称五大特产。也是这里农牧

民的主食品种。别的哪个地方的品种也不如这里的好。老年人说那是由特殊土壤决定的。红泥石子地上所产的糜、谷颗粒大，色味佳，只要吃上一顿就再也不会忘记它。

糜子品种分为红、黄、白三种，碾下的米叫黄米，大概是因为色极黄而得名的。焖饭、捞捞饭（即蒸米饭）、熬粥，都是上等品，做出的饭金黄金黄的，吃进嘴里又津又甜又香，越嚼越有滋味。它是这里农牧民最主要，永远喜爱，常吃不厌的主食品。这在当地民歌里都有真切生动的词句：

新糜米捞饭开河鱼，  
想死想活见不上你。

大煨羊肉新黄米，  
哪哒儿见你哪哒儿喜。

新米捞饭生金黄，  
天天见你天天想。

黄米捞饭手把肉，  
大人娃娃吃不够。



庄禾人离不开糜子米，  
走到哪哒儿也忘不了你。

黄米捞饭羊腥汤，  
死也不会把你忘。

特别是新秋糜子刚熟时，从秸秆上掐来尚好的穗子就湿揉下的活糜子放在锅里烘干碾下的米叫什拉米，那个精美香甜劲呀，凭你用怎么丰富的语言也难以把它形容周全。

将黄米用温水浸泡过，上碓子捣成面，放到锅里刷熬成糊糊，经过发酵，蒸成馍馍、窝窝，摊烙成画儿（用黄米面摊成类似煎饼状）酸甜爽口，吃过后回味无穷，想起来也让人觉得食欲大增。

梁外农牧民生活饮食习惯：早饭多是糜子窝窝，蒸山药、撒上葫麻盐（将葫麻籽炒熟，搅入适量的咸盐，上碓子或用小磨子捣磨成面即是），味特浓香，掺拌起来，再就上点酸咸菜，吃起来爽口难言，越吃越想吃。

糜子窝窝是将糜子磨成的面，放到瓷盆里，用开水烫住表面一层，待稍晾凉后全部和起，放到热处经过发酵，呈糊状，上锅蒸熟就成

窝窝了，虚腾腾、黄铮铮，酸甜兼备，风味殊异。

红茶、炒米，既是蒙古族牧民最喜爱的饮食，也是汉族农民酬宾待客，厚爱不衰的佳品。熬茶、炒炒米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活儿，也是汉族农民的拿手好戏。这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结果。红茶味道醇厚，有提神助兴，促进消化和血液循环之功能。炒米呢，黄淋淋，脆生生，味淳香，好消化。客人来了，首先熬一壶红茶，端一盘炒米，再配上酥油、奶酪和砂糖；敬请品尝，促膝叙话。炒米里搅和适量的豆瓣，再拌上白糖干吃，香甜美脆，越嚼越香。当地人说这是神仙的生活。梁外地区流行的情歌里是这样形容它们的：

清湛湛的凉水熬红茶，  
一看见妹妹就心开花。

红艳艳茶水泡炒米，  
看上你一眼就心里头喜。

红茶浓来炒米香，  
守住哥哥不想娘。

中午多为黄米捞饭或焖饭，山药烩酸白

菜,再加入猪肉或猪油,就成了浓香扑鼻,味道殊异的酸烩菜了。当地农牧民在山曲里唱到:

情哥哥来了怎招待,  
前锅锅烩上猪肉菜。

猪肉山药烩白菜,  
不想走来只想在。

拌汤捞饭。拌汤是将黄米煮到快熟时捞出一两碗来晾到簸箕里,待稍凉,加入适量豌豆面搅拌起来,将簸箕不断摇筛,使之尽成圆圆的小颗粒状。待锅里的饭捞出后,再将摇拌好的颗粒倒进米汤锅里熬煮熟,然后加入适量的用麻油炆过的干红腌菜丝(将腌酸蔓菁丝晾干后再上锅蒸绵,再晾干即是),或腌沙盖(沙芥)丝稍熬就成了。光喝或泡捞饭吃,光滑利口,别是一番滋味。它能诱使你喝了一碗再一碗,肚子饱了还想喝。民歌中唱到:

拌汤捞饭就咸菜,  
娘养下开始就把你爱。

黄米捞饭熬拌汤,  
天天见你天天想。

晚上多为和菜稀饭，蒸山药、蘸葫麻盐，就酸咸菜。

以上是早年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平人家的大致食谱。一般穷苦百姓可没这个水准。他们早上的糜子窝窝往往要搅上糠或野菜，有的是谷子面的。那就逊色多了。

山药是谁家也离不开的，是这里农牧民的一大主食，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犹如中药里的甘草；当地民谚是这样说的：

早晨窝窝和(蒸)蔓蔓(山药的别称)

中午不离山药蛋，

晚上来个太变化，

山药切成几瓣瓣。

还有一种说法是：

早晨蒸的蛋蛋，

中午切成瓣瓣，

晚上切成条条，

也可切成片片。

以上民谚都是说梁外农牧民的饭食每顿也离不开山药。

山药既是梁外地区农牧民的主食品之一，又是各种饭食的配料与调剂品。连提起来家家

会自己制作的粉条子，打凉泻火的凉粉皮也是用山药粉子做成的。确实是家家户户，顿顿做饭都离不开山药。加之这里的山药特殊（这是由特殊土壤决定的），上锅一蒸，皮都自己脱掉了，吃到嘴里沙娄娄的，味道特异。只要蘸点葫麻盐、就点酸咸菜，吃多少也不厌烦，当地人风趣地叫它“剥皮饺子”。

生活离不开山药。谈情说爱、交朋友也离不开山药，就连反映生活习俗的情歌里也离不开唱山药，这里选录几首，以见一斑：

大红山药地里头长，  
娘养下就把你爱上。

大红山药土里头窖，  
心里头爱你谁知道！

山药开花儿苗苗旺，  
主意就打在你身上。

情哥哥来了好喜欢，  
炉坑里烧上两颗山药蛋。

· 梁外人的另一种主食荞面：

荞面可以做成多种多样的美食，如饸饹、圪坨儿、圪哒、削面、拨面、搅团（也叫牙糕）、凉粉，还可以包饺子、炸饼子，摊绰阿煎（软饼子）搓成荞面角角，等等。

黍子碾出的米叫软米。用温水淘过，上碓子捣成面，拌适量的水蒸出的糕叫素糕。将山药削皮切碎，和猪肉丁或羊肉丁一起熬成糊状的汤蘸素糕吃，香美不过。将素糕捏成片儿或加馅捏成大饺子形状炸成油糕吃，会使你因过于香美而忘乎所以。如果是用麻油炸出，不仅那淡绿而鲜嫩的色泽使人赏心悦目，一饱眼福，吃起来更是可口美气，不一阵，就会使你因过于香美而昏昏然，进入甜蜜的梦境。素糕撒上麩子面略微发酵，捏成一个一个小圈圈，上油锅炸出，叫作油圪圪儿，酸甜可口，是逢年过节款待宾朋的上等佳品。塞外人用素糕拌入适量麩子面，经发酵酿成的黄米酒也算一手绝活儿，这种黄酒酸甜兼备，色味具佳，且有提神助兴、增补元气，消食健胃的特殊功能。梁外地区人每家到了冬天都要做些黄米酒，放入瓮内，来了亲朋好友，先用黄米酒款待。

过去，梁外大部分地区属于旱缺水、蔬菜

较少，斯种的菜多以大白菜、蔓菁和胡萝卜为主，都是到晚秋时节腌酸再吃，每户人家都要腌几大筐。白菜的腌法多是在开水锅里焯过再腌，洗干净生腌的也可以。蔓菁、萝卜之类有的用擦子擦成丝丝腌成酸碎菜，也有整个（整个）腌酸后切成条条吃的，也就是一种每家自制的、一种常备小菜。这种腌制的酸白菜及酸碎菜等，至今仍是人们所喜欢食用的，每家都有腌备，一直能吃到来年接上新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的东胜市内，饭馆、饭庄比比皆是，有许多风味小吃餐馆专门经营制做别具风味的沙锅荞面，荞面圪坨儿、烩酸菜等以及文内提到的各种梁外饮食。

# 灶火壕大渠的形成 及水利的发展

白述英

灶火壕位于东胜市布日都梁乡境内南部，东西长约 10 公里，南北宽近 2 公里，南西北三面环山，呈长方形盆地。百年前，西南部有一个水海子，土地肥沃，水草丰盛，是极好的牧场。由于开放蒙疆，经商放垦，灶火壕成了神木、府谷和晋西北通道的站地。来往行人，过往客商，每到这里，就打尖住夜，挖炉灶做饭，故名灶火壕。

光绪年间，垦务局放垦卖地，神、府二县李、冯、王、郝四大户，联合把地买下，开荒种地。开始是跑青牛犊（春出种，秋收回），后来住下大种罌粟。

民国 22 年（1933 年），夏秋连续降雨 10 多天，水海子的水充满外溢，将东沙圪旦推成了水渠。之后 3 年又发了 7 次大水，把条水渠



冲成长 8 公里、宽近百米的从史家渠至昆都伦大川的大渠。到 1949 年渠中部深已有 17 米多。大渠两侧的支毛渠年复一年增多、加宽、加深,把一个完整的灶火壕切割成支离破碎的两半,阻碍了交通,车辆和重载骆驼队都要绕道行走。水土流失的出现,沟渠扩展,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下湿壕地减少,加之掏沙蒿开荒种地,不多几年,土地开始沙化、退化,生态环境变劣,粮食减产。

1951 年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多年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不控制水土流失,就无法生存。广大农民积极要求水保治理。通过农会协商,成立了灶火壕水利委员会。委员会由主任张仲明、副主任袁二满、委员徐三宝、冯铁柱、李考四等 5 人组成。水利委员会组织农民自愿集资投工,筑拦洪坝、淤洪澄地等水利工程,按股分摊工程费用。报名入股者有 30 户,最多有入 3 股的,最少的人半股。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筑成了拦洪澄地坝,移动土方总量 15 万立方米。另外,完成了 16 条澄地埂堰,澄地 500 多亩。1953 年在澄好的地内耕种,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亩产 350 斤以上。1954 年还清

了淤洪澄地时的借贷粮 10 石糜子和贷款本息 2000 万元人民币(旧币,1 万元旧币等于 1 元新币)。同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土地归集体管理,又加固了拦洪澄地工程,增加了澄地堰道。到 1956 年洪澄地发展到 1200 多亩,在史家渠、赵家渠、油坊队还搞了水土保持防洪设施工程,保护了洪澄地,发展了水利。1957 年冬,重新组织了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仲明,副主任委员冯铁柱,各生产队长分任委员。每队抽调 3 个劳动力,组成 35 人长年水利建设队,冯铁柱兼任队长。县水利水保站技术员刘奎、张华等帮助设计了第一座水库(中心坝),高 18 米,长 83 米,顶宽 5 米。水库建成后安装 10 马力锅驼机,后改为 40 马力柴油机 2 台,浇地 400 亩。1958 年春,灶火壕大队聘请盟县下放劳动锻炼的专业技术人员马玉林等,对灶火壕水系全流域作了整体调查,制定了实施方案。提出的口号是“山洪水不下山,水库水不出川,灶火壕要变成小江南”。经羊场壕公社批准,依照实施方案,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于夏锄后、收秋前集中一个月的时间搞灶火壕大渠上游史家渠水土保持治理大会战。全公社抽调

200个劳动力,用5000多个劳动工日(每个劳动工日国家补助面粉1斤),移动土石方6万多立方米,挖鱼鳞坑、沟头埂,将梁坡地全部进行了埂化,治理控制面积1500亩。当年秋和翌年春,灶火壕大队在地埂、鱼鳞坑种上了树、柠条和草木栖。是年冬,灶火壕长年水利建设队及参加公社民兵训练的民兵,用3个月的时间投入3000个工日,移动土方17000立方米,建成了史家渠水库。1959年春,在灶火壕大渠下游连续修了3处蓄水塘坝,搞蓄河造地,将原有的30亩下湿沟地,经过垫地改造扩展为250亩水浇地,修梯田70亩。秋天,灶火壕大队组织水保大会战,以水利建设专业队为主,各生产队分段包干土方工程。经过一个冬天的苦战,完成了赵家渠和油坊队两处防洪渠,各渠长1000米、宽42米、深1.7米。翌年春,在防洪渠堤的内外全部种上了树和柠条,形成了一条植被防洪堤。之后直至1963年一直坚持了水利建设,在大渠的中下段,拦截卡渠2000多米长,筑坝修水库5座,库库有鱼,可浇地3000亩,有效灌溉面积2000亩以上,保灌面积1500亩。

1967年,开始修建抽水站,架设高压线路,国家投资18万元,灶火壕大队自筹低压线路费用4万元,建起16处电动机抽水站,其中:油坊队2处,配14千瓦电动机2台;居民点队3处,配10千瓦电动机2台;屈家壕队1处,配10千瓦电动机1台;郝家口子队2处,配10千瓦电动机2台;东胜县灶火壕国营苗圃2处,配10千瓦电动机2台;东胜县良种繁殖场2处,配10千瓦电动机2台;伊盟种鱼场3处,配10千瓦电动机3台;伊克昭盟会区浑库1处,配5.5千瓦电动机1台;东胜市粮油公司也设有水车点。1972年完成全部渠系配套。

灶火壕大渠流域的全面治理,控制了水土流失,将原来的水患变成了水利,加之合理的规划,山水林田路统筹安排,灶火壕基本形成了田成方、渠成网、树成行、路成线的鱼米之乡。

# 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

何知文

## 富有情趣的民族文化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在这块沃土上，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传统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即俗语所说“乡有乡俗，民有民情”。民间节日就是其中的一类。

古往今来，人类都是按照时令节气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传统的民间节日就是按时令节气确定的，也叫岁时节日，又因其活动中渗透了各种风俗民情，故又叫岁时礼俗或岁时节俗。时令节俗活动是人类极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中创立的数目繁多的节日礼俗，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所有角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左右人们的观念和行动的民族文化的巨流。

时令礼俗是以民俗信仰为基础的。活动内容归纳起来有礼仪的和禁忌的两种。细分则有农事、祭祀、纪念、庆贺、郊游、娱乐等类。有单一的，也有复合的。其日子有固定的，也有不大固定但相对固定的。有的是佳节，要尽量吃喝、庆贺、娱乐，喜气洋洋，其乐融融。有的则是带有民族习惯和迷信色彩的“忌日”，要禁忌诸多活动，以为防范不测，人人遵守，谨小慎微，以保人畜家宅平安。

时令节俗的特点是周而复始，每个周期都在一年一度同一个日子内连续反复地循环。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遇到许许多多多次。

时令节俗涉及到许多学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丰富多彩，绚丽斑斓。因为不断重复而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谁也不会遗忘，届时都要重复做一次，且尽喜欢期盼，谁也不会感到厌烦。

就地处伊克昭盟梁外地区的东胜来说，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大概也有二十几个比较讲究的民间节日。当然，这要和现在全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竟有三百七十来个节日相比起来，只是沧海之一粟，高山之一角。现在流传下来的

这些节日,有的对于促进改革开放,搞活当地经济,也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良好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民间的节日,是历史上多年代形成的一种传统的风俗民情,它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是一种普遍而特殊的民族文化活动,就伊克昭盟梁外地区东胜来说,象征性的节日程序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礼仪风俗,而且至今仍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说起来还都情趣盎然,独具风韵呢。现就将伊克昭盟梁外地区东胜农牧民中的流传已久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古风犹存的风土人情及一些主要的时令节俗略做探讨介绍、供大家研究参考。

## 正月初一接财神

元旦,为正月初一的旧称。在汉语文里,元有初、始之意。旦者日也。故元旦为一年的初始之日。民间说“正月初一头一天”,即大年的第一天。

在中国,早在隋朝就将这天称为元旦了。隋朝学者杜台卿所著之《玉烛宝典》上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旦。”一千多年一直这么

称呼。解放后才将公历的元月一日称为元旦，也把这一天叫成新年。而将传统的古历年改叫成春节，并逐渐形成专有名词。不过，在民间仍称春节为大年、老年。

大年初一这一天，天刚放明，熬年守岁的家主人就起来放开门炮，接财神，降吉祥。在此之前是谁也不能开门出外的。放开门炮时，将门拉开一小半，双响炮捏在手里或放在门舷上，用香火去点燃炮捻，务使一声响在家里一声响在门外为好。炮响之后，紧接着主人就要念诵接财神的吉祥辞：“财门开，财门开，斗大元宝滚回来。财门开的高，斗大的元宝往回跑，财门开的低，斗大元宝往回挤。恭喜发财，财源茂盛，一年四季，事事通顺。”然后点香火，敬财神，其他人方可出外。

人们走出门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炮，表示接财神，迎喜神，对财神爷的欢迎。并把身上沾染的妖气邪气和穷气统统炸掉，使浑身上下，干干净净，吉吉利利。放炮时，有条件的最好每人要放六个，没条件的响六声也行，因为六、溜、路谐音，以示今年一溜大吉，路路通顺。

出门时，每个人都得拿点熟食如馍馍、油



糕、油圈圈等，到院里的火塔子（注：用煤炭块堆成空心塔形，当地称之为旺火。）上烤热吃了，名为吃接年食。据说吃了这接年食就可全年吉利，不生疾病。

从外面再回家时，每个人都得捡拈点柴棍棍一类的东西拿在手里，意谓搂财、抓财、接财、招财进宝，积聚财物，因为柴、财谐音。

日出之前，上点年纪的人都要到附近最高处或爬上房顶去看天——看今年年景丰欠；哪种庄禾可丰收；哪里将下冷雨（即冰雹）（一般以晴朗和空气清新透明为好，阴晦为不吉）。据说包括社会升平和是否有所动乱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天，谁见了谁，都要象久别重逢的亲人挚友那样热烈地互相问候、祝贺一番。即使本家人也照此例，出到院里或从院里回来就问候。因为相隔一年了，表示喜欢亲昵，祝愿对方健康长寿，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这一天，大家都要在家休息，吃喝玩儿乐一般不出门到别人家去。一是说这一天所有的鬼魅魍魉都被大年下的熊熊焰火和如雷炮声熏燎震荡的昏头昏脑，在地面上乱跑乱蹿，怕

碰着它们闯出祸来,尤其是怕那些饥神饿鬼附在身上跟回家来。二是告别了忙碌劳累的一年,尤其是一个腊月的劳累奔波;再加上除夕夜晚的守岁熬年,已使人们精疲力尽了,新年伊始,大家都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以利再干。更可贵的是合家团聚。

这一天不能做营生,连担水扫院也不能。担水会担回狼儿子,它们起哄造反灰折腾,会使家宅不安,人畜不宁。婆姨(注:陕、晋、蒙部分地区对妻子、女人之称)女子们要切记不能做针线。据说是怕刺坏龙眼,扎破籽(指)头,这样,天旱火燎,庄禾就不出籽儿了,自然没有收成,其实恐怕还是那些懒婆娘们为了逃避劳动,想坐吃一天而臆造出这么个唬人的口实。再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女一贯不得平等,只许男人胡作非为,坐享吃喝,不准女人稍微越轨,休憩瞬息。聪明的女人瞅准要害,编造出这么个谎言,于是,她们争得了每年潇洒这么一天的“专利”。特别是那些财主大户家里的女佣丫环们,通年四季没有偷闲之空,好容易有了这么个规矩,大家又都信以为真,以至传为民俗乡规。

这一天，禁忌往外面倒送东西。地下的垃圾也要在日落之后略微打扫存放在一处，意味积聚财物。天天如此，直到初五早晨才能倒送。

从这天开始到月底，未婚女子都不能做针线活儿，尤其禁忌做鞋。因为鞋、邪音谐（当地鞋读孩），鞋、害又为谐音。怕她们做出邪事，招来祸害，这大概是聪明的姑娘们为了好事休息，走出闺房家门，观看红火热闹，玩耍开心而捏造的足以镇慑封建佬们的理由。因为说的在理、只好依从，并且形成节俗规矩，使闺女们的人性欲望得到了一点伸展的机会。

过大年和正月初一都忌吃鸡肉。因为初一是鸡日（详见后），为了体恤它们，不忍在生辰之日食其肉。此乃人之感情所使。还因鸡、饥谐音，为避不祥，故忌之。

## 正月初二吃饺子

正月初二是吃捏嘴饺子和开始拜年的日子。

早晨起来，家家户户都捏饺子（当地多叫扁食）、吃饺子。饺子馅多为黄萝卜丝与牛、羊

肉，也有全是牛肉或羊肉的。这天的饺子名叫捏嘴饺子。据说是为了捏住婆姨女子们的嘴。民谚说：“一个老婆一面锣，两个老婆加面鼓，三个老婆胜台戏。”如果每年不早早把她们的嘴给捏住，别人就会被吵的没有活头。婆姨女子都嘴馋，搞点好吃的，再把嘴给捏扁，她们就不会吵闹翻天了。年轻媳妇们出去拜年，也不会没完没了地耍贫嘴跟长辈们要钱了。

捏饺子时，要找几个铜钱（解放后用硬币）分别包到几个饺子里。吃上包钱饺子者，意味捞住钱了，预兆他今年张口有钱，开门进钱，钱源滚滚。获食者自然兴高采烈、喜不自胜。但也有的说吃上包钱饺子的人，是眼睛就瞅着钱眼子的财迷精，六亲不认。这样，获食者就会感到晦气。大家都以一笑了之。如果被年轻媳妇们或小姑子们吃上，就成了笑料和“斗嘴对象”，她们之间会互相“争斗”戏闹一阵。

吃完饺子，小字辈们就要梳洗打扮，带上礼物，出们给长辈亲戚们拜年去（自己家的吃早饭前就得拜过）。这个礼俗可一直沿至正月十五元宵节。

正月初三为羊日，忌出远门。羊羔生下要

乖乖地守住母亲吃奶奶，方可得到保护和温暖，顺利成长。远离母亲，可能逢凶。故把这天称为守家。也有叫守财的，意味过年以来积聚下的财物要大家合力守护，以防不测。

从过年开始的狂欢，一切生活均与往常不同，间有诸多禁忌。到初五这天，一切禁忌都被解除，所有生活均恢复正常。公家启印办公，商店开张营业，农民工匠们都要收拾一下工具，以示要动手干活儿，等等。所以这一天被称为破五。

破五日的一个重要节俗是送“穷媳妇”。头天晚上睡觉前，把家的拐拐角角全部打扫干净，将扫起来的垃圾尘土和前几天积聚起来的全部弄到一个家具里，放到地脚旯旮，这就是“穷媳妇”了。好离好走，再给敬上一柱香，放上一点儿供品，表示让她享受享受。初五早晨日出之前，将垃圾送出大门百步以外的路边倒掉，并且念道：“穷媳妇穷媳妇早离门，今天把你送起身。×××家里吃席去，×××家里扎老营”。然后放个响炮，意思是表示欢送，实为怕她不想走或折回来，所以再补上一炮，咋唬咋唬，让她赶快走掉算了。这里所说的“吃席

去”和“扎老营”的人家，都是地方上有钱有势、群众厌恶眼黑的财主大户的姓名。“穷媳妇”离门，也给她指个方向去处，送个人情。揣想此俗缘由，恐怕是那些连老婆也养活不了的懒汉败家子儿们穷得无聊，遣怒于妇女们的一种恶作剧吧。但为什么能形成一个家家户户都不敢遗忘的传统的时令节俗呢？

送“穷媳妇”送掉的是元旦以来积聚下的灰土垃圾。把垃圾叫成穷媳妇加以发送，可以窥见中国封建社会蔑视妇女的一斑了。反回来说，民间节俗：元旦以来的垃圾都是被视为“财物”而积蓄下来的。把“财物”当成“穷媳妇”发送，也可看出懒汉败家子儿们有眼无珠，把财神爷当恶煞鬼踢出门外去了。

## 小年辨正

正月初六过小年是神木一带居民的乡俗。府谷一带是初七过小年。

伊盟西部地区大都初六过小年。蒙古族也一样。府谷一带多数也只好入乡随俗了。因为那里神木人居多。东部区的情况就不同了。地

处中部的东胜市居民中是神木和府谷各过各的，故有两天红火，也很开心。但追本溯源，小年应该是初七过才对。中国古代就把这一天定为人日，也叫人七，称为小年，普天同庆。

传说天地初开的时候，地球上什么也没有，宇宙洪荒，寂寞异常。为了使世界热闹起来，造物主在正月初一造了鸡、初二造了狗，初三造了羊，初四造了猪，初五造了牛、初六造了马、初七造了人、初八造了谷……从此，地球上有了六畜、人和五谷，开始熙攘热闹了——这就是人和人日、人七的来历。

在中国古代民间的传统节日里，这一天也是热闹非凡的，皇宫放假，皇帝老爷也要出来与民同乐，热烈庆贺，美美红火一番。所以，出门在外的人，这一天都要赶回家里团圆，欢度小年。不能如愿者会特别苦恼和伤感。隋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因描写入微道出了常人心声而脍炙人口，至今传诵不已。杜甫也有“草堂人日我归来”的名句流传。

神木居民不知什么年代，改初六为小年。是不是神木的婆姨女子们过于嘴馋，急的等不上初七吃好的，初六就给吃开了？

## 祭星、谷日

正月初八是谷子的生日。

造物祖先造了六畜和人，为了让他们生存下去，这天又造了谷物，好供他们食用。大家无不高兴，每逢这天，便一齐出门欢庆。希望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过好光景。这叫祭谷。

故乡村从这一天起人们就走出家门，互相邀集，大闹红火了。

据说这天又是天上诸星下凡的日子。大家都祭祀一番，表示欢迎庆贺。名叫祭星，也叫顺星，即请诸星顺心之意。

早饭后，每家每户的家主人和青年男女们都要骑上骡马（也有步行的），带上香火祭品和炮，向山空的方向走去，到了适当地点，大家都面向山空的方向摆好祭品，点燃香火，祭祀一番，放了炮，即欢天喜地，载歌载舞而归。多数人还要骑上好牲口比赛一场，特别比赛走马的兴趣最浓。互相吆喝呼叫，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非常热闹。

传说每年都有一方山空着，那一方的妖魔鬼怪受到冷落就要出来骚扰众生。所以人们便



在过年后选定天上诸星下凡，它们让路归山聚会的日子，在欢迎诸星降临的同时，给它们也送些祭品，供奉一番，它们就不出来胡闹，扰乱人间的生活了，且能逢凶化吉，通顺如意。这种活动就叫祭星，也叫顺星。大家对于这种提前安顿吃鬼的活动都很积极认真。“要拿深山虎，先安四邻土。”否则，便会遇到麻烦。祭谷也好，祭星也罢，都是为了消灾避邪、吉祥如意、事事通顺，所以又叫顺行，即希望一切行动通顺如意心想事成。

民间故事中，相传正月初十是老鼠娶亲的日子。为了让它们安心娱乐，少与人作对，人们决定不予打扰惊动。所以这一天忌动碾子，磨和碓臼等石器，谓之石不动，动者逢凶。因为老鼠也不是好惹的。“进剿不如安抚好。”这大概是人们为了外出观看红火热闹而找出的借口，终于获得认可，并历代相沿承袭，逐成民俗信仰，演为节俗的。

这天晚上，各家各户都要捞煮点精米捞饭，再弄点其他尚好的食物放到前、后锅之间的炉台上、瓮舂晃、凉房子（北方称放杂物的库房为凉房）等老鼠出没之处，有的人家还要给

点上一柱香，以示虔诚，让它们娶亲路过此处能够吃好喝足，就不至于胡乱遭踏苦害粮食了。据说有的人夜深人静睡下后，只要枕上一个马鞍子或驴大鞍就能听到老鼠娶亲的鼠群经过的动静，十分热闹，还有串铃声和吹鼓手呢！

人们对老鼠采取的这种“安抚做法”直至演成民间节俗，究竟能否凑效，也无从考究。

## 正月十三、十四、十六、十七的传说

正月十三忌出门。传说这一天是红沙日子。饥神饿鬼，凶神恶煞遍地疯跑，出门探亲易逢凶，故皆禁忌。奇怪的是，这样的禁忌日，一年竟有十三天，每月一天，六月是两天。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二月十一、三月初九……月隔三天，上半年向前推，下半年朝后移。这大概是那些驿站的差役们成年累月奔忙不息，为争取休息一天而设计的圈套。也许是别人出于同情而为他们设计的。不是吗？你看，每月一天，唯独六月炎热、酷暑难熬是两天。不管怎么说，每月都能在家休息一天。

正月十四破籽头也叫破籽节。早饭后,家主人走出家门,有的拿起铁锹,有的扛上镢头,走到地里刨挖几下,再把事先捣破皮的籽种撒扬上两把。否则,春天籽种入地后就不会生芽出苗。所以,对破籽头这一节俗农民都不会忘记,财主大户们记的更切,尽管他们一年四季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这一天也要跑到地里刨挖几下,扬撒几把。做做样子,象征一下。

正月十六戒瘤疮。这一天只能坐吃玩耍,谁也不敢出外干活,特别是不能干泥水活儿。手上一沾泥土,就会浑身害上瘤疮,那是非常危险可怕的。这可能是财主大户家的长工们闹罢元宵,红火热闹累的不行了,为了要好好休息一天而想出的绝招。你不让休息吗?我们害上瘤疮就不能给你干活儿了,还会给你们也传染上,多么凶险呀!无奈,只好乖乖地答应他们的要求。

正月十七钉蚰蜒。毛蚰蜒是一种节肢动物,象蜈蚣而略小,黄褐色,生活在阴湿的地方。传说它夜间出来专寻娃娃们的耳朵、屁股钻,一旦钻进去,就会搜烂肠子肚子再从嘴里爬出来,还会咬烂他们的舌头。所以,在农村

里，娃娃们哭起来哄不住时，只要喊一声“看，毛蚰蜒来了！”他们立刻就会吓得直眉瞪眼起来，立刻就不敢哭了。那家伙即使从大人身上爬过，也会在肉皮上留下一道红肿的伤痕，奇痒难忍。如被咬着，毒性很大。

这天早晨天刚放亮，女人们就悄悄地爬起来拿一把铁锥子憋着气，狠狠地钉在炉台上方的墙壁上。这样就会把令人讨厌和生畏的毛蚰蜒统统钉死，个别漏网活了的，也不敢轻易跑进人户家里了。如果不钉的话，毛蚰蜒就会成群合伙地爬出来侵害人，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 正月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也叫灯节、上元节。它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合称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普天同庆。

根据古籍记载，汉武帝刘彻当政时，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运昌盛，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躬临太乙庙通夜掌灯祭祀。从此，各代皇帝皆相承袭。传至唐太宗李世民时，又将

点灯祈福与宗教敬佛联在一起,让教徒也都为民祈福,并定为一项全国的礼制。届时朝廷放假,普天同庆,官民同乐,尽情玩乐一夜。唐玄宗李隆基更将欢度一夜改为三夜。提前红火。届时,首都长安城内要设灯楼、搞灯展、灯市,还要在附近最高的山顶上扎起七丈五尺以上的大灯树,上挂一百盏彩灯,至夜一齐点燃,五彩缤纷,辉煌耀眼,加上烟花爆竹,让百里以外都能望见夺目艳丽的光彩,映明半壁天空。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又将元宵节延长至五天。他的后人还嫌不够,从过罢小年就开始红火。那天适逢祭谷节,意义更加丰富浓厚。从此流传一千多年,盛况不减。至今,民间正月闹红火,都是从初八开始,渊源即此。

中国人向来有一种上行下效的老毛病。皇帝老爷那样做,京城那样做,加之朝廷明令让举国同欢,民间自然都要效仿一番,在全国,不论东西南北,村村寨寨,都要张灯结彩,尽情红火,尽情欢乐。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舞龙戏狮、打玩艺儿(即演二人台小戏)、点灯灯、转灯游会等等,这种节俗,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至

今相承不衰。而且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尚有越来越盛之势。

过年之后，人们欢度春节的亢奋劲儿尚未消减，又值一年伊始第一个月的圆月之夜，正值农闲，人们在欢度春节的情趣尚浓之中，从过罢小年即从家里走出外面张罗集体娱乐闹红火，至正月十五达到顶峰。即使在伊克昭盟高原梁外地区东胜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偏僻、闭塞、荒凉、落后的地方，百姓也照样要尽情地红火一番。正月十五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己制做的灯笼裱糊一新，色彩鲜艳，阳婆（太阳）一落就点着升到高高的灯杆顶上悬挂起来。有条件的人家，大门上、畜圈口也都要悬挂一盏。有的人家娃娃们也要每人给扎一盏小灯笼提在手上玩耍。小灯笼大多是将指头粗细的沙柳条子烤热熏软，用刀劈成两半，平面朝外，弯成半圆弓形，由6—8根组成，两头弯曲到大小不等的上下两个小圆圈，里面用细麻绳子缠扎住（也有底下不座圈只用细麻绑扎的）上面留的口子大些，下面放灯的圈儿留的小点，再用各色彩纸从外面裱糊起来，就成了大小不等，形

状各异的小圆灯笼。也有用高粱秆儿或沙竹棒扎的，那只能扎成方的。然后将萝卜、蔓菁或山药蛋(马铃薯)削成小圆盅状，中间挖成空窝儿，倒进麻油，安上灯捻子，用一块小石片压住，点着放进小灯笼里，上口系上双股绳子，娃娃们提上到邻居家互相夸耀、比赛，看谁的最好。一群娃娃串连起来提上小灯笼东跑西蹿，象一串串流星飞动，煞是好看。

元宵节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闹”字，闹红火，闹社伙，红火热闹，二人台小戏还有《闹元宵》的节目。特别是流传极广的“挂红灯”就是描写闹元宵的民歌，至今每逢元宵节，东胜街头巷尾仍是到处播唱，仍是小城内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人们在烟花爆竹、彩灯焰火的闪烁喧闹中通宵达旦，纵情红火，纵情热闹，纵情娱乐。在这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一向遭受压抑和禁锢的身心得到了解放，即使跑跳的腰酸腿疼，浑身疼痛，也没一个叫苦的，反而都觉得美滋滋、乐融融，精神抖擞，其乐无穷！人们还认为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特殊的休息。只有这样，生活

才有意思,才有情趣,才充满了活力。可见民俗文化对人们的生活是何等重要,它是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兴奋剂和催化剂。

## 正月二十三、祭羊节

二十三是正月的最后一个节日。

这天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荞面包子,也叫荞面角子(形似饺子但比饺子大的多)。包子蒸熟后,要先弄一碗让羊倌儿端上到羊圈里去,其中必须有两个大包子,里面各包两个小包子。吃之前要立正站在当圈,双手端碗,高高举起,把吉祥的辞语念诵一遍:“二十三,菜包子,献给羯羴(注:公绵羊)和母子。羯羴吃上精神好,母羊都下双羔羔。母子下母子,三年一股子;母子下羯子,三年一拨子。恭喜恭喜、兴旺吉利。”念毕,赶快把包子全部咬烂吃掉——这叫祭羯羴,也叫咬赖包。这样祭祀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使羊群兴旺。

这天另一个节俗活动是燎干净。

晚上,所有的人家都要在院子里燃一堆或



几堆大旺火(用煤炭块堆成塔状,从里边空心内点燃)。人们都要在大堆上跳过来跳过去,反复多次。名叫跳火塔子。娃娃们跳不过去,就由大人抱着跳。然后再拿一个燃旺的火把,从家到院,包括鸡舍猪窝畜圈,拐拐角角,统统燎扫一遍,叫做燎干净。这样一来,就会把所有的邪气,阴神恶鬼都给烧死烧绝,使家宅人畜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大家轻松愉快,开始备耕劳动,争取好的收成。

## 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初二为中和节,俗称龙抬头。它也是一个中国民间普遍重视的节日。唐诗宋词里就有不少关于二月二的描写。不过,它正式形成一个民间节日是明朝后期的事,所以它的历史不算太长。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主宰兴云播雨之事,是一地位显赫,倍受人们敬畏的尊神,又是一个令人亲近的吉祥物。它们养精蓄锐,卧息一冬。现在春天来临,农民即将开始耕种。它

们醒来了，抬起头来准备行动，自然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庆贺。

这一天，男人都要剃头，女人要揪黄毛，名叫剃龙头，拔龙盖儿。意思是龙王爷抬头，大家都要取掉头上积垢，头轻眼亮，轻轻快快地准备春耕，迎接丰收。

婆姨女人们忌做针线活儿，以防动针刺伤龙眼。

家家户户都要吃一顿油炸食物。用油炸东西，名叫熏虫。据说这样一熏烤，各种害虫都会被熏死，个别未死的也不敢轻易胡闹遭害人畜和庄稼了。

日落之前，家家户户都要掏出炉坑里的柴草灰，筛过后，绕着住宅（包括场面、畜圈等）撒一圈儿，全部围起来，再分隔围住。个人都得站在中间用灰撒个圆圈儿将自己围起来，然后跳出去。这叫围灰场儿，跳灰圈儿。因为龙王爷们经过一冬休息睡眠，现在抬起头来要整饬世界，阳世三界的小神碎鬼都很害怕，都要躲进自己的巢穴里暂避锋芒，人们乘机将住宅畜圈等用灰围住，它们就不敢接近和侵害来了。因

为传说中，鬼最怕灰，人身上也难免附上什么妖魔邪气，用灰围住再跳出来，妖魔邪气就会被丢在里面，绝不敢越雷池一步。

## 寒食、清明

寒食节又叫禁火节。这是因为在节日的三天内忌动烟火，大家只能冷饮冷食而得名。

在古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民俗节日，大家都非常重视、认真。在历代的文字作品里反映甚多，单就唐诗里吟咏寒食节的诗篇就枚举不胜。

寒食节的日子不大固定，它是在每年冬至后的第106天，清明节的前一二日内。一般都在农历的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相对固定。民间有“三月清明不见青，二月清明遍地青”的说法，是按冬深浅和春寒暖而言的。

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时候，晋公子重耳在逃亡到卫国被困陷于绝望时，跟随他的大臣介子推忽然不见了。众人都说他可能逃跑了。重耳不大相信，说介子推不是那种人。不久，介子推

果然回来了，他给重耳端来一大碗肉汤。重耳正饥肠辘辘，饿的就快要命了，没问三七二十一，端住就喝，一气吞下肚里，觉得香美无比。后来，当他得知那碗肉汤是介子推为了救他而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的时，心中激动不已，决计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对待介子推。

重耳当了晋国的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后，对过去跟随他的大臣都论功行赏，做了重封，唯独漏了介子推。舆论哗然。介子推却毫不介意。当有人提醒之后，重耳恍然大悟，觉得很对不起介子推，立即派人请他来要加重封赏。介子推却逃进山林里躲藏起来，过起了轻闲自在的隐居生活，怎么也请不出来。晋文公重耳无奈，便叫人放火焚烧山林，逼他出来受封。不料当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介子推却抱住大树同归于尽了！重耳闻讯十分悲痛。为了堵塞舆论和国人口舌。纪念介子推的忠烈精神，他下令每年在介子推被焚烧的三日全国禁动烟火，一律冷饮冷食——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

因为寒食节在三日之内禁动烟火,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别扭,受不了。因此,唐宋之后逐渐有所淡漠。又因它和清明节紧紧相连,人们大多数合并起来过了。年深月久,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便认为寒食和清明是一回事,一个节,其实原是两个节日。

清明是个时令节日,届时,大家都要上坟点纸扫墓,祭祀故世亲人,带有迷信色彩的说法是:这一天所有的鬼都要回归墓穴,各就各位,等待凡间亲人祭祀,送去钱物和好吃的。是个“鬼在墓”的日子,凡间烧送下的钱物,它们都能如数收到,不会有丝毫损失走漏。

民间有迁坟揭幕,合葬老人的大多在这一天进行,百无禁忌。所以民间对这个节日十分重视,连官方也都认可承袭。出门在外的人,这一天要想方设法赶回家上坟点纸扫墓,祭祀亡灵,寄托哀思。不能如愿者,被视为一大憾事。此心此情可引杜牧《清明》一诗为证: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注)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注：行人悲痛亡故的亲人，心情郁闷，思绪纷纭。

## 苦菜节

“三月三，苦菜芽芽往上钻。”

因为苦菜能给人解决吃饱肚子问题，被誉为穷人的救命菜。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它。在梁外地区的春季里，它是农牧民唯一能见到尝上的新鲜野菜，大家都在盼望它，采撷它。据说农历三月初三是苦菜的生日，这天的苦菜芽芽特别鲜嫩可口，还能治疗许多疾病呢。

古历三月的苦菜刚窜出地面展开一两片小叶儿，日出之前采回来用水洗干净、嫩黄青绿淡白相间，撒入适量的盐面儿，同黄芥油、豆瓣酱、酱油和醋调拌起来，鲜嫩可口，色香味美。无论你用怎样的语言，也难准确形容出它的美气劲儿来。吃过后回想起来，准会流涎三尺，如醉如痴。更可贵的是苦菜还有清眼目、泻肝火、降血脂的功能，是一剂民间良药。

## 风向定丰歉

“三月初七刮北风，十分糜子收九分。三月初七刮南风，人人都拿讨吃棍（一说家家户户吃棉蓬。棉蓬：塞外高原上的一种草本植物，荒年时，百姓用其籽做食度饥荒。）”。这是讲天时的谚语。当地群众却坚信不移，说这是老辈先人们立世以来朝朝代代品验出的真理，绝对准确应验，不会有半点出入。

## 祈子节

“四月里，四月八，娘娘庙上把香插。”

传说这一天是送子娘娘向人问赏赐儿女的日子。凡是少儿缺女的善男信女，这一天都要到娘娘庙上去敬神磕头，祈求得到儿女。为了子嗣，即使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累断筋骨，也心甘情愿。可见中国老百姓的子嗣承袭观念有多浓厚。

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故名佛诞节，也叫浴佛节。《后汉书》和《三国志》上

均有记载,说明那时就已形成民间岁时节日了。至唐宋,衍为盛举。据宋金盈之《醉翁谈录》中说:“佛告大众,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初八夜半子时生。所以者何?为春夏之际,殃罪悉毕,万物普生,毒气未行,不寒不热,时气和适,今是佛生日,人民念佛功德,浴佛形象。”

在有佛教庙宇的地方,这一天用香水为佛祖金身洗澡洁身,视为一大盛举,僧众都要往观敬佛,鼓号齐鸣,热闹非凡。去的僧众俗汉都要争着蘸点为佛祖洗过澡的香水抹在自己头上,以示吉祥避邪。俗汉同时可获子嗣。可见中西结合,只要搞得好,人民满意,都是饶有情趣的。中国人从不盲目排外。

## 端 阳 节

亦称端五节(也写端午)。吃粽子,赛龙舟,在南方人民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他因为反对朝廷腐败黑暗,软弱卖国,屡次进言诤谏不听,反遭谗毁放逐,气愤不过,于五月五日这天自投汨罗江,以身殉职,



表示抗议。国人悲愤，尽提粽子投入江中，让鱼鳖虾蟹吃粽子而勿食屈原。赛龙舟也是为了抢救屈原，水中动物看见“龙”无不害怕躲避，这就会使抢救更加有利。

在高原梁外地区的端午节习俗是吃糕、戴艾、戴花绳儿。

头一天晚上，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要用五色或七色线搓成一根根花绳儿，初五天还未明之前就给娃娃们拴在脖子上，手腕脚腕上。大人也戴，多拴在手的无名指和脚的大姆指上。还要用五色绸布和彩色丝线缝制，绣成鸡肚儿，虎头、牛头、马面的小袋子，里面装进艾叶、雄黄和五谷撑起来，下面坠上花穗穗，上面系上花绳儿，给娃娃们戴在脖子上，五颜六色；绚丽斑斓，煞是好看！往上系戴这些时，都由家庭主妇早早起来闭着嘴悄悄地做，其他人都在床铺里，但也得闭着嘴不能出声。有的人家还把娃娃抱出来倒坐门槛，拴好戴上之后，再抱回被窝里去。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祛妖避邪，洁身纳祥保平安。

这天早晨日出之前，人们都要到野外去采

艾。这天采的艾叫端五艾，用途很广，功能极大，能治疗许多疾病，尤其用在针灸上功效神奇。艾叶塞在耳朵里，蚊子小虫不敢近；揣在衣兜里，苍蝇蚂蚁不敢爬；用艾水洗过的身子，臭虫、跳蚤不敢咬……

粽子也吃。没有粽叶，就用头年晾下的玉米叶或芦苇叶包。什么也没有的话就吃凉糕。粽子、凉糕里都放进红枣，全是为了避邪纳吉。

进入五月，骄阳似火，天气炎热起来，各种有毒害虫开始侵害人身，疾病开始流行。所以，中国古人将五月叫成恶月，初五又是五月里最不吉利的一天，故有上述禳避之法。有的地方竟把这天出生的孩子视为灾星降临，是“五月底五的鬼崽子”，以狼狐鸟类之食而抛弃荒野，所以在北方梁外地区五月初五过生日的极少。即使真的生在这一天喂养起来的，也要把生日改在别的日子去，以此回避。

有的人家这天还要捉蛤蟆晾药。传说这天的蛤蟆捉来吊在阴处晾干后能治许多疾病，且功效神奇。这天一般是见不到蛤蟆的。民谚有“五月的蛤蟆躲端阳”的说法，是说它们这天都

藏起来了。

汉语“端”有“初”意，故初五也叫端五。又“五”与“午”通，按照地支顺序推算，五月即午月，午时属阳，因此端五又叫端午，也叫端阳，端阳节。

### “关老爷磨刀节”

五月二十三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这一天，大小不等，总要下一场雨。因为关老爷磨刀必须蘸水。典故中传说这是玉皇大帝特地批准让龙王爷们为他服务效劳的。如果不下雨，干磨一气，那就是龙王爷们的失职行为了，一定要受到追究和惩罚。

如果这天不下雨，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本年多龙治水。它们互相依靠，人间必倒锅灶。这年就要遭灾。于是，老百姓无可奈何，只好勒紧裤带多锄地，用保持水份的方法，拯救禾苗，以此对抗龙多不治水，不靠天吃饭，自力更生争得收成。

二是传说不知哪位懵懂凡人冲撞了龙王爷，惹恼了它们，因而，对下界凡人进行关、卡。

于是，大家就聚众集资，给龙王爷领牲上贡，请他不要计较懵懂凡人，应该好好体恤下民，兴云播雨，广济众生。

有些靠天吃饭的梁外地区农牧民对这一天十分重视，特别是天旱的时候，巴不得这一天早日到来。通过领牲上贡等方式求雨，祈盼好收成。

## 龙王爷开庙门

五月二十五又是另一个传统节日，是龙王爷开庙门的日子。

入春至五月十五如果还没下雨，庄禾牧草就都旱了。再不想办法，一年就会没收成。于是大家解囊施舍，在龙王爷们开庙门的良辰吉日里，拿上香表供品，拉上羊，到龙王庙上领牲上贡，对上苍祈讨一番（也就是祈雨）。

给龙王爷领牲必须用膘情好皮毛一色的山羊羯子，至于羯羝、母子、带花的都属禁忌。领牲时，先给龙王爷怀前点上香，再将要领的羊拉到面前，用干净的清凉水洗净四蹄耳朵和

尾巴，再给嘴里灌漱一口，表示里里外外全洗净，然后顺着脊梁从头至尾浇洗一次，大家跪下诉清缘由、恳请领受。待羊浑身大抖一过，说龙王爷已接受恳请。领了心意。于是，大家喜形于色一齐磕头，起来即杀羊分肉，名为分牲。

就一般来说，这天也要下雨。因为大家这么虔诚地敬供龙王爷，它们也应该有所表示，给点实惠。如果还不下雨，那就不是龙王爷的事了。大家就要恳请龙王爷们出马祈雨，希求得到上苍的谅解和恩典，惠洒甘霖。

按照民间习俗，不管天怎么旱，也得等过了五月二十五才能开始祈雨。龙王爷开庙门日就是这么来的。

龙王爷出马祈雨是一项很有情趣的活动。请看唐代诗人李白是怎么描述的：

桑条无叶土生烟，  
箫管迎龙水庙前。  
朱门几处看歌舞，  
犹恐春阴咽管弦。

——《观祈雨》

龙王庙上大都备有用木头做的有门有窗，

形似庙宇的祈雨楼子，请画匠彩画出来，五颜六色，悦目欢心。两边“山墙”上各安两个圆铁环。祈雨时，将龙王爷的金身塑象请到楼子里的正中位上，怀前摆上香炉供品和打卦卜榔，外面用布施彩绸挽成一个个花朵和着彩绸扎结起来。找两根端直溜光的长木椽（均有专门备用品）穿到两边的铁环里面，前后左右4个人扛在肩上走起来，绚丽多彩，鲜艳夺目。参加祈雨的人一二十至二三十不等，一律赤脚、赤臂、大胳膊上还得用刀拉开一寸来长的口子，直至肌肉翻出，鲜血淋淋，以示虔诚。这叫暂马头。都用带叶的活柳条编扎成的圆圈戴在头上。当龙王爷启动出马时，彩幡舞动，遮天蔽日，鼓乐齐鸣，伴以悠扬嗨碗的祈雨歌调；十几里之外都能听到。祈雨队伍所过之处，不论走路的还是其他做什么的，远远地就得跪下向龙王爷磕头，直至全部队伍走过去才能起来。

为了保持楼子平稳，龙王爷不受颠簸，抬楼子的4个人步调必须一致、心地必须虔诚，不能存有半点疑心。否则惹恼龙王爷可不得了。别看不过三二十斤重的那么个木楼楼，能

把4个人挫压的大颠小蹶，身不由己，汗水淋漓，气喘吁吁，逢山上，逢沟下，压倒爬起来，爬起再挫倒，直压的肩膀红肿，直跌的头肿眼青，也不稍停。这时，只有众人一齐跪下承认过错，求情祷告，方可得到龙王爷的谅解和宽恕。

## 马王节

六月二十三是马王爷圣诞节。

在以农牧业为主的塞外草原，人们对马王爷的崇拜和供奉是十分虔诚和隆重的。不少地方都建有马王庙。可见重视之程度了。

这一天，养马的人都要买上各色绸布和彩线结扎成大小不等的穗子、花朵系在马头、马鬃、马尾上，把马子打扮的花枝招展，十分好看。一为祝愿马群兴旺，二为避妖祛邪，三为显示马主人慷慨大方。家家都要领牲杀羊，祭祀马王，表示对它忠实效劳的赏赐。羊肉自然是给人解了馋，至于马王爷是否享受上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马历来是人类的重要役畜。骑乘、耕种、拉

车、驮运、碾碾、围磨，都离不开它们。在捍卫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战场上，它们是将帅和兵士们冲锋陷阵，驱除降服敌人的得力“助手”。因此，大家把为国家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说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创造了马神——马王爷——加以供奉。可见马受到人们的保护和器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国民间对马王爷的供奉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远在春秋时期就有四时祭马神的习俗。历代沿袭，且有愈演愈盛之况。这是人们出于对重要役畜宝贵和器重的基因。

传说马王爷有主宰和佑护骡马等大畜的生死肥瘦、健康疾病、兴旺成群等神通。据《北平岁时志》记载：“凡驴马等健肥疲羸，死亡疾病，莫不归马王主之，享祀丰洁，则牲畜蕃遮，营业顺利。否则，灾病交侵，营业亦大蒙其损焉。”

当地马王庙内供奉的马王爷神像皆为赤面、圆脸、大胡子，两眼炯炯，当头顶上还竖着一只大圆眼睛。手执刀械，身披甲冑，脚登云靴。两边有“躡山跳涧，如履平地；追风赶月，日



行万里。”或“上山敌猛虎、下海斗蛟龙”的对联。

## 中元节

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叫鬼节。

相传这一天是地官的生日，也是它每年一次上天汇报情况和决定阴阳界善恶的日子。

地官的职位虽然不高，管事却不少。举凡宇宙万物、诸路神仙、人畜禽兽、妖魔鬼怪，都要受它的检察汇报。奖、惩、罢、免，都由它决定。这天就是它裁决上述情况的日子。它要拿出神仙、人类、动物、鬼怪的花名册，逐一审查圈定，根据它们平时的表现，决定奖励、处罚、治罪或赦免之举。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十八层地狱的、盼望得到解放的罪人和冤魂孤鬼们更是一个难得日子，除此，它们就得不到解脱和重新投胎的机会。人间捏面人面兽，宰牲祭祀的节俗活动，都是出于人类固有的怜悯与同情弱小受压者的良心。为那些无端遭受冤屈治罪者制做替身，为那些冤魂屈鬼们获得宽恕和赦

免而举行祝贺,同时也为款待地官,希望它能够明判是非、秉公执法、洞察秋毫,保护那些无权无物的善良弱小者,为那些无辜受屈者们伸张正义。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将七月十五形成一个传统的民俗节日了。

这一天,养羊的人家都要领牲杀羊吃好的,再怎么穷的人家也要设法吃一顿肉或较好的饭食。

这一天,婆姨女子们都要捏蒸面人。那是将发过酵的白面搓好揉到,根据需要切成大小不等的块、团、条、片,再经过揉搓、捏塑、装饰、雕刻、剪裁,捏塑成各种形象不同的人 and 动物,放锅蒸熟后,再用红绿颜色点画一番。就成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和动物。捏的最多的是象征福寿的大胖罗汉;象征富贵的蛇盘兔;喜笑颜开、英姿勃发的狮子;龙凤呈祥,展翅飞鱼,百鸟朝凤,刺猥降蛇,牛头、马面、肥羊、胖猪等十二属相的所有动物……心灵手巧,眼捷手快的婆姨女子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夸耀自己的手工技艺。若将捏塑好蒸熟点画出来的

所有面人经过点染,摆放到一起,俨然一个人和动物的雕塑展览,花花绿绿,煞是美观。婆姨女子们爱听好话。观看者啧啧称赞,不断夸奖,她们便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心花怒放,神采飞扬。可惜过去梁外地区白面甚少,一般穷苦人家只能把黄米捣成面再搅点白面来捏,有的还得和点蒿籽面,就这也能把娃娃们喜得蹦跳起来,老人们笑的合不上嘴。一派的节日欢腾。

## 中 秋 节

中国人老早就把一年分为四季,每季三个月,按顺序称为孟、仲、季。八月是秋季的仲月,十五又是这个月的正中之日。仲、中谐音,故称中秋节。

远在西周(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时期,当朝天子(即后来的皇帝主子)每年二月十五要祭日,祈求老天风调雨顺,让下界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八月十五要祭月,感谢老天恩典赏赐,人间喜获丰收了。

到了秦汉时期,这一天,全国上下都要举

行敬老活动。上至皇帝老爷，下及地方官府要员，都要向其属下的老年人敬送手杖、椅凳、圆饼、桃梨瓜果等物，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执政后，将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让普天同庆，官民同乐。从此，做为中国四大民俗传统节日而沿袭下来至今一千多年，久盛不衰。历代骚人墨客吟咏中秋节的诗篇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农历八月中旬，天高云淡，空气清爽，五谷登场，桃梨瓜果成熟的黄金时节。这天夜里的月亮，也是一年之中最圆最亮的一天，古代多有“月到中秋分外明”的诗句。在这样的美景良辰中，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农牧民将自己用汗水换来的果实精心加工，做成各种美食，对老天爷的照顾虔诚地感谢一番，原本是情理中事，也是中国农民自然朴素感情的真诚表现。凡养牲畜的人家都要杀只好羊，没有羊的也要拿粮食换或用钱买的肉来美食一顿。虽然梁外地区不种瓜桃梨果（今东胜也引进，并有出产，如葡萄、苹果、苹果梨等），也总要千方百计跟商贩

们换买一些。白面没有,也要想方设法筹划一些,与米面搅和起来,做出的月饼也照样酥甜香美。老天爷决不会计较这些憨厚、诚实、纯朴的农民敬献给它的礼品菲薄。至于高原上流传的民歌里说“西瓜沙来月饼圆,都不如哥哥涎水甜”的话,那是青年男女情人们内心真情实感的大胆吐露,老天爷决不会怪怨她们,更不会因此而菲薄农民的心意。

传统的祭月(谢月)方式:

夜幕降临,朗月当空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院子里摆好香案,把最好的大西瓜从中腰用刀豁割成上下对称、锯齿式的花牙状,用手掰成两半迎天摆好,一如露水中初绽的两朵莲花,鲜美红艳。再将最大最好的月饼、桃、梨、苹果、葡萄等统统摆到桌案上,再放一升新五谷或新黄米做为插香之用。各样供品全部摆好之后,即点燃香火,全家人一齐跪下向月亮娘娘虔诚地叩上三头,家主人起来将每种供品向天向地各撒散一点。默默地祝愿月圆花好,人寿年丰。这叫拜月。完毕,全家起来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供品,一边观赏月亮,大人向娃娃们

讲述月亮上的宫殿、桂树、金蛤蟆、玉兔与嫦娥的故事。娃娃们一边静听，一边观赏嫦娥玉兔怎样捣药，提出一个个幼稚可疑的问题，但只许嘴问，不准用指头去指。用手指划是很不礼貌的，据说指头上还要害指疥。那是十分可怕的。

婆姨娃娃们开始串门子了。她们走到邻居院里观赏各家供品花样，月饼做的如何，品评今夜月色风光及来年收成丰欠。哪家月饼做的好的，少不了赞美一番。受到夸奖的自是沾沾自喜，飘飘欲仙。

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因此，人们对圆特别崇尚。即所谓花好月圆。梁外地区居民家中家具、器皿也多以圆为美。很多事物都以达到圆满为美好，事情办好为圆满，亲人欢聚为团圆，连女人们佩带的金银首饰也多以圆为好。所以，中秋节献给老天爷的各种供品都是圆的，月饼是越大越圆越好，有的竟能盖住锅口。因为人间的一切均为老天爷赏赐，做为对老天爷的报答，自然以慷慨大方为好，决不能刻薄小气。这是高原人民古仆的受惠报恩传统

思想的具体表现。

## 重阳节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

按照中国古代说法，九属阳数。历代均有九月艳阳之说。再是九日也属阳，故称重阳。那时天高云淡。山青气爽，牛肥马壮，五谷丰登，人的精神也格外亢奋昂扬。历史上对这一天十分重视，骚人墨客吟咏这日的诗篇也很多很多，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似可做为代表：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塞外高原，秋高气爽，百草枯黄，大家只能弄些霜打过的艾叶装在口兜里或擦擦手脸，以此祛妖避邪，接纳祥和。生活富裕些的杀只羊，淘点新软米，吃顿肉蘸糕，充充肚福完事。至于登高赋诗赏菊花、饮美酒，那是达官贵族等有

衙阶级的勾当,对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水月镜花,只能听听看看,饱饱眼耳之福,实践则不可企及。

梁外地区谚语有一说:“初九至十三,不下一冬干。”这是对九月天气的谚语。是农民经过多年多代品验出来的,跟“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一样,据说很准。所以农家对这几天特别关心,眼巴巴望着天空。要看个究竟,这大概就是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实践中悟出的道理吧。

## 冬 至

这本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不知怎么也变成了一个民俗节日,并有“冬至如年”的说法。古代文人关于冬至的诗篇就很多,如白居易、苏轼等,各代均有。说明此节形成已历史悠久了。

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从这天开始,白天渐长、黑夜渐短。所谓“冬至阳生”,大概也从此意而来,数九也从这



天开始。民间有“过一冬、长一针”和“连冬数九”的说法，是很切合实际的。

冬至的日子不怎么固定，只是相对固定。一般是在大雪后的15天，农历11月中旬，阳历12月22日—23日之间。这时羊卧了（为供冬天食用而成批地杀羊叫卧羊）、牛宰了、猪杀了，是农牧民一年之中肉食最为充足丰富之时，故梁外地区有“肥冬瘦年饿腊八”之说。

冬至的节俗活动一是祭祀故世亲人，从前三天即开始上坟点纸敬贡，直可延至后四天，老坟不在当地的。可于早晨日出之前或晚上日落之后到十字路口面向老坟所在的方向笼起火堆点烧祭祀，呼唤亡灵来收钱两，以此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和敬重。二是吃好的，早早就把事先烫洗干净的牛羊头蹄和猪头蹄炖在锅里，加上文火，慢慢熬炖，炖的时间越长越烂越好，这叫熬冬。至晚，大家欢聚一堂，热热闹闹，美食一顿。穷苦人家东西不多时，要让娃娃们先吃，吃好，大人只能品尝剩下的。中国人的爷娘爱、父母爱，疼下观念由来已久，且最浓厚。于此可见一斑。

这一天，出门在外的人都要尽量赶回家里与亲人团聚。共度佳节。流散在外，天隔一方，即被视为遗憾。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家》里有这样的诗句对这种习俗表达的情景交融，入微至备：

邯郸驿里逢冬至，  
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  
还应说着远行人。

说明远在唐代，冬至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民间节日。根据史书记载，这一天朝廷也要放假祭典。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上说：“冬至日，祈天于南郊，（夏至祭地是在北郊）迎长日之至。”说明我国远在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冬至祈天的礼仪了。

传说从这一天开始，地面上的阴气逐渐消失，阳气开始上升。苏东坡咏冬至的诗里也有“井底微阳回未回”的句子。证明此说由来已久。所以，每家每户都要把水瓮（缸）淘洗的干干净净，然后担回新的阳气之水。还有一说这种水，可以冷饮，不论吃上什么，决不会闹肚子

出毛病。直到夏至以后就不能喝凉水了。这些习俗在唐宋时代就有记载。民间一些老中医看病，也有叫人数九天喝冷水的。效果尚好，且很神奇。什么道理？很值得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鉴定，以便促进人类的身体健康。

## 腊 八 节

节在腊月初八，故得名。据说这天为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不过，在高原民间的节俗活动似乎与佛祖无关。

这天的节俗活动主要是熬食腊八粥和打腊八冰。

腊八粥在初七晚上半夜前后即开始熬了，尽量提前。天明之前就得熬好，梁外地区早有流传，说是这天晚上“谁家烟筒先冒烟，谁家庄禾熟在前。”所以，婆姨女子们有整夜不睡而熬粥的，赶鸡叫就都熬好了。吃腊八粥也是越早越好，东方发亮之前就都吃了。据有关资料记载：“黎明食之，稍迟则忌之，曰犯红眼病。”当地俗语则说：“谁家吃粥吃的早，谁家五谷成熟

早”。

吃腊八粥要一反平时吃饭的规矩礼貌——让最小的娃娃先吃。这样，来年秋天小糜小谷等小日期庄稼就能首先成熟。这是直接关系到来年收成与生活的大事。故做的相当认真。

熬腊八粥是以软米、豇豆为主，伴以碗豆、小麦仁、玉米碴、桃仁、杏仁。不过，这些掺和为数极小，多少放点，有那么个意思，能看得出来尝得见就行了。入锅前，都要逐一淘洗干净。熬制时，先后下锅的次序是“豆类、桃、杏仁、玉米碴、小麦仁、软米、红枣，最后加入适量红糖。水里要加入适量的天然碱，这样，熬出的粥就呈红色了。而且，色泽红艳，光滑流利，精坚绵甜，软硬适宜，爽口溢气。

熬腊八粥的水里，要先加入适量的马牙碱水。这是为了使粮豆快烂，增重色红，吃起来光滑利齿好消化。

腊八粥熬好之后，先要弄点稀的用刷子给灶火口、门口、大门口、畜圈口等处各涂抹一点，以图吉利，保护家宅、牲畜等平安无事。

梁外地区居民有着带迷信色彩的传说：说所有的鬼都怕红色，特别是红色的豆子，鬼见就怕。这样，腊八粥自然就具备了降妖祛邪的非凡功能。

腊八这天梁外地区人的另一个习俗“打冰”，这天早晨东方刚刚放明，人们就到井上或河边担水、打冰去了。名叫打腊八冰，冰打回来之后，要在日出之前给门口、窗台、大门口、凉房、畜圈、场面、柴垛、粪堆等处都要放上一块。每个人还要吃一点。据说这腊八冰能升阳降火、通上理下，并有禳灾纳祥之功。吃了它，大人娃娃不生病，放在粪堆、畜圈、场面上，可避来年火旱之灾，接纳丰收。

## 祭灶节

腊月二十三是民间大年前的最后一个民俗节日，叫祭灶节。

传说这天是灶马爷升天回宫的日子。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美餐一顿，特别是当地的蒙古族人民把这一天看的非常重要，出门在外的

人要千方百计赶回家来团圆,把最好的羊胸脯全炖出来,饮酒吃肉,尽情欢乐。

这一天,祭灶马爷是这一节俗活动的主要内容。晚饭后,拿来事先准备好的一碗清凉水,里面放入一撮黑豆和少许谷草(干草)节子,再弄些其他供品,摆到炉台上,点香敬表后即将这些全部倒进炉堂里燃烧,再拿一块糖来转炉圈子涂抹几回,一边涂抹,一边念道:“灶马爷灶马爷本姓李,一坨挞糖来抹你的嘴。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凡人有错误,请你多担当,只说好,别说歹。明年百花开,再迎你老来。恭喜恭喜,双手捧起,快快升天,好好报喜。”民间还有一首关于祭灶马爷的歌谣是这样说的:“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衙点上一柱香。当家的过来忙祝颂,祈求灶王爷降吉祥。”

## 百无禁忌大忙年

过罢二十三,灶马爷升天“言好事”去了。

被派驻检察下界情况的各类神仙也都回天尊报一年来人间情况去了。所以，从二十四到年底这段时间成了世无主持之神，属于百无禁忌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做自己想做和要做的所有事情。勿需害怕撞这碰那，招致不祥与祸害了。

这段日子里叫做忙年。主要活动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一年来的诸多事情，方方面面都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和了结，短人家的要偿还，外面欠的要收回来，所谓“大年来临，有帐要清”。也是一个成规定型的民间习俗。

二是采购年货，置办年货，修缮房舍，美化环境。将里里外外，修饰打扫一新，清清洁洁，使大家都能精神爽快，欢欢喜喜，迎接春节。

当梁立柱的，四处奔跑，选购年货。婆姨女孩子们喜气盈盈。昼夜不停，缝新洗旧，准备吃喝。她们还要刁闲瞅空，剜剪窗花儿，名叫剪纸。这是农村妇女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代表她们的审美观念，艺术造形活灵活现，是农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有剪牛马驼

羊、猛虎雄狮、狗兔追逐、鸡猫嬉戏、狐狼搏击，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剪花草虫鱼、龙凤呈祥、百鸟活动，糜谷扬穗，高粱举旗、玉米抖彩，瓜果吐翠，桃李喷香，色彩流溢……，维妙维肖。过年时全部贴在门窗眼上，五光十色，鲜艳夺目。一则渲染气氛，令人欣喜，二则炫耀他们的心灵手巧，技艺高超。客人来了仔细观赏，不断赞扬，她们便心如灌蜜，眉飞色舞，高兴异常。

春节临近，常跑乡村的货郎子们更忙于走村串户，叫卖窗画儿年货。因为农牧民都安木格杈子门窗，窗画儿也均为10—12公分见方的木刻白纸套色彩印，花花绿绿飞翠流霞，鲜艳炫目。窗画儿多以鸡、狗、猪、羊、牛、马、骆驼和五谷穗苗及桃、李、水果为主，色彩明艳，绚丽斑斓。家家都买，销的很快。这大概因为所画内容形象与人的关系密切之故，也是一种传统的民俗风情和信仰。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窗花儿、剪纸，均以鸡图最多，千姿百态，各有风韵。这大概因为中国古代以阴阳观念解释宇宙万物，且多以阳为



吉。鸡属阳物，被视为避邪祈福纳祥之禽。汉代成书的《风俗通》上说，贴画鸡于户上，“百鬼畏之”。《花镜》一书上说鸡“雄能角胜、目能避邪。”周亮工的《书影》里说：“盖北地类乎吉为鸡，俗云室上大吉也。”这说明鸡、吉谐音，象征吉祥，由来已久。还有中国古人认为鸡有尚好的德行。《韩诗外传》说鸡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花镜》解释这五德说：“首冠顶，文也；足搏距，武也；见敌能斗，勇也；守夜有时（指终生都能每日按时报晓），信也。”

中国人历来爱鸡、养鸡，年画、窗画也画鸡，除认为鸡具五德，有避邪祈福纳祥之功外，与历代的宣扬论教也不无关系。

过大年和正月初一忌吃鸡肉。大概因为初一为鸡的生日之故，为了体恤它们，故不忍食其肉。另外还有鸡、饥谐音，为避讳不详之意。

到了腊月二十七，即开始上坟点纸，祭祀故世亲人。表示过年不忘祭典先祖神灵。

灯杆（即升挂灯笼的杆子）也要在二十七、八提前栽起。杆顶上还要绑扎一把沙蒿，取柴、财谐音，象征招财聚宝，财源茂盛。杆顶上固定

拴个用柠条根或机柳根条曲成的圆圈，穿入长绳，双头垂地。将糊好点着的灯笼系在绳头一端，抽拉另一端，灯笼即徐徐升空，至杆顶，将手拉的绳拴固在杆上，灯笼即固定在高空中，犹如颗颗艳丽的明星，渲染着高原的夜空。

## 春联趣话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写贴春联（也叫对联、对子、门对、楹联），把环境门庭美化一遍，使之艳红，一派新鲜。

春联两条一对。都要选用美好吉祥、工整对仗的词语，书写在鲜艳的红纸条幅上，张贴起来，渲染气氛，以示祝愿。

在我们中国，写贴春联这个习俗由来已久，真可谓源远流长了。它是由桃符发展而来，从律诗演变而成的。

在律诗里，每两句称为一联，春联也由两句构成一对。律诗分为五言、七言两种，春联的字数多少可以不等，但每副二联的字数必须相同，且以五言、七言两种居多。律诗要求两句一

联要对仗工整，音韵平仄都要有一定的规格陈式，要讲究协调和谐，好的春联也大致要求具备这些条件。

我国古代的民间习俗：人们在过年的时候，要弄两块桃木板子，写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悬挂在门的两旁，象征吉祥如意，且有镇妖逼邪之功。这桃木板子就叫桃符。《玉烛宝典》上说：“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名。”神荼、郁垒，传说是能治服所有妖魔鬼怪之神，故被民间供奉为门神。把它们的大名书写在有祛妖避邪之功的桃木板上，悬挂在门的两旁，所有的魔鬼都会望而生畏，惧而远之。从而达到家宅安宁，吉祥如意，百事通顺的愿望。

至五代，悬挂桃符的习俗更加普遍，连皇家宫廷的楹柱上也要给挂起桃符了。据史书记载，后蜀的国君孟昶在过年的时候，请学士们给他寝室门的桃符上提写联语。学士们怯生生皆感畏难，说他们干不了这个差事。于是，孟昶自己提笔写了两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学士们看了一个个惊的五体投地，赞叹不

已。据学者考证,这是我国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副春联。

国君开风,短不了到处仿效,于是,编写春联之风便不径而走,推而广之,蔚然成风。到了宋朝,不论城镇,还是乡村,过年写贴春联已经成了普遍的习俗。大政治家、改革家、诗人王安石的著名诗篇《元日》就是描写这种盛况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王安石在过新年时写的一首即兴诗。元日:即元旦、新年,现在叫春节。屠苏:烧酒。瞳瞳:光明耀眼的样子。

全诗短短四句、二十八字,内含却非常新颖丰富,让人百读不厌,感触至深。

首句是耳闻,说在一片响亮悦耳的爆竹声中,又除去了旧的一岁,迎来了新的一年。二句写身感,说烧酒所以滚热暖和,是因为新的春风给它吹进了温暖的气息。三句写目睹,放眼看,千家万户,门庭一新,光明耀眼,喜气盈盈,

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景象。四句总结，身心所感，到处都是一片节日欢乐，春意盎然的新气象，究其原因，就是人们用新的桃符取代了旧的牌子，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其乐无穷。

诗虽短小，却极富哲理新意，充满了对新事物、新生活的热爱情趣，读来耐人寻味、浮想联翩，立即就把人带到欢乐温馨的节日气氛中了，享受到了送旧迎新、鼎力奋进的情趣。同时，王安石这位让人敬佩的大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诗人的喜悦形象，也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清朝富察启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说：“春联者，即今之桃符也。入腊之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贴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说明书写春联，已成了文人墨客的一项活动了。

然而，在旧社会里，塞外高原，山野草地，识字人极少。百姓家的春联多是刮上一点锅底黑、用水和起来，拿饭碗的底圈圈蘸上黑水水印在红纸条幅上，成了一个个黑圈圈，圈圈套圈圈，这就成了新对联。贴挂起来，看着还老美

气呢！

如今塞外高原的小城——东胜，每逢春节早上，在一片烟花爆竹声中走出门外举目四望，家家户户门窗一新、大红对联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 年的传说及其他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山林里有一种叫做年的动物，它硕大无朋，凶猛残忍；跑的飞快，犹如旋风，它一出来，人和其他兽类就都在劫难逃，非得填饱它的肚子才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吃喝玩儿乐，忘乎所以的时候，也恰好是它获得美餐的大好机会。

在与年的长期斗争中，聪明的人类终于发现了年的“秘密”，原来它最害怕红的颜色、响声与火光。于是，为了安度新年，大家就在门口、窗口及住宅周围贴上红纸，晚上挂起灯笼、燃起火塔子（也叫旺火），并不断放鞭炮或敲响其他器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年就吓的神魂颠倒，逃之夭夭了——这就是贴对联、挂灯

笼、燃旺火、放鞭炮的由来。

在人类尚未发明造纸以前，对联只能用桃木板子代替，因桃木是红色。在没有发明火药之前，当然不会有炮。那时放火塔子都用竹子，竹杆烧着发热后，节筒里的空气澎涨、爆炸，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弄的火花四溅，烟腾雾罩。这就是人们把炮叫成爆竹与烟花爆竹的缘故。

过年那天叫除夕。日落之前，要在门口、大门口、库房门口等，各放一块大炭（梁外地区农牧民多以烧炭为主，以炭代柴）。意味招财进宝。大门口和门口还要立上铡草刀和菜刀，刀刃都朝上，皆为逼邪镇妖，如有恶妖瘦鬼或年那样的猛兽胆敢前来蹿犯，都会扑到刀刃上，以此来保护新年大吉，家宅安全。

饭后茶罢，点香放炮，燃着事先用羊砖（将羊圈里长年积下踩结实的厚厚的羊粪层用铁锹裁成砖形大块启起来晾干即是，冬天顶炭烧）、柴禾、牛马粪垒起来的火塔子（即旺火）燃着，使满院明亮，如同白天一样，到处漫着浓郁的牛羊马粪的烟香气味，热腾腾、暖烘烘，天地充满了温暖情。这时大家都要梳洗打扮，换上

最新鲜的衣裳，使全家老少、男男女女，焕然一新！围着火塔子热闹一番。然后回家把置办下的所有的美食佳肴，好烟好酒，一齐摆放出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喜笑颜开，吃喝品尝，饮酒叙话。这叫吃年夜饭，也叫团圆饭。这时，长辈们开始给小辈们发放压岁钱，使他们喜上加喜，更加高兴起来。

就这样，前半夜，全家人欢聚一堂，一起品尝年食，大人喝酒饮茶，说说笑笑款款叙话，尽情吃喝，尽情取乐，尽情玩耍。娃娃们活蹦乱跳，点灯放炮，嬉戏不停。这叫守岁——旧岁将去，大家都恋恋不舍，依依斯守，不忍离别之意。大家斯守也是为了等待财神爷的光降莅临。

交过半夜，即进入新的一年了。大家一齐涌到外面点香放炮，美美实实红火热闹一阵，表示欢送旧岁荣归，喜迎新年来临，喜接叫人通顺吉利、发财致富的财神爷光临。人们一个个心花怒放，喜气洋洋，沉浸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烟花爆竹的汪洋大海之中，如醉如痴，娃娃们更是东奔西跑，乐不支——这叫迎年，也叫



接岁。

财神迎来岁接回，复归家中，续香敬表，再次开始吃喝玩乐，直到黎明，这叫熬年。意思是把财神爷迎来之后，大家都要陪着财神爷取乐玩耍，以免他感到孤寂不悦。

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梁外地区，一年十二个月内，民俗节日竟是这么多，且有的还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些节日流传至今仍很兴盛。

# 东胜地名略考

黄开学

东胜市境是鄂尔多斯的腹地，在古代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草场。清末，陕北汉民陆续来这里开荒，由于大量开垦，牧场日渐缩小，蒙古族牧民多数向杭锦旗、鄂托克旗等地逐水草而去。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设东胜厅，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县，1983年改市。

由于历史的变迁，民族的迁徙，自然环境的变化，东胜市现所辖乡、村、社名及市境自然实体名复杂多样，五彩缤纷。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满语地名，也有蒙古语和汉语混合的地名；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也有具有新时代色彩的地名；有以姓氏、人名命名的地名，也有以动物、植物命名的地名；有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也有以寨子、敖包、道路、召庙、商号、作坊和手工匠命名的地名；同时还有以方位、

序号等命名的地名。下面就市境内各类地名分别作一粗略的考证。

**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东胜,系汉语,是由古代州名而来,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设胜州,胜,含决胜、取胜之义。辽胜册元年(公元916年),辽军攻入胜州,将胜州居民全部迁往黄河东,并在今托克托县大皇城设置东胜州。东胜,表示在原胜州之东的意思。现市境在元、明两代曾是东胜州、东胜卫辖地,所以清末设厅时以东胜为厅名,改县、设市都沿用了此名。布日都梁乡吉劳庆村的吉劳庆,系蒙古语,意为缰绳者,指驭手,或御车者,是指专门守护成吉思汗陵寝一支的专称。其先辈为成吉思汗的侍从,后裔奉命专理成吉思汗生前骑乘具及遗物的管理和祭祀事宜。布日都梁乡达尔汗壕村的达尔汗,系蒙古语,是达尔扈特的变音,意为圣神,泛指免除徭役赋税的人,即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达尔扈特部,此地是守护上吉劳庆霍洛达尔扈特的驻地。据今已有489年的历史。达尔汗特部落信奉喇嘛教,在上吉劳庆驻地北面建有喇嘛庙,藏语名为热希区爱皮岭,达尔扈特人

仍把吉劳庆称庙名。柴登乡台什村的台什，系蒙古语，是元、清两代的职官名，意为太师，据1740年所绘《鄂尔多斯蒙古七旗地图》载，此地南部山梁名台什（来历不详）。

二、以地理特征命名的地名。罕台庙乡的罕台，系蒙古语，全称为罕台良德尔乌拉，意为最高的山丘。据说在元朝时一位大将去京都赴朝途中经此地时因发洪水而未能按时赴朝。喇嘛教传入鄂尔多斯后在此建喇嘛庙。藏语称葛登纳枯爱岭，蒙语称罕台良德尔庙，后简称罕台庙。布日都梁乡的布日都，系蒙古语，意为绿洲，鄂尔多斯蒙古人进驻此地时，此地为一片绿洲。柴登乡的柴登，系蒙古语，是“柴达玛”的变音，意为沼泽滩地。漫赖乡的漫赖，系蒙古语，是“迈了”的变音，意为沙漠中的沼泽草地。泊尔江海子乡的泊尔江，系蒙古语，意为混浊，此处原有一个含碱硝的水海子，现已枯干，蒙古人称泊尔张淖尔，汉译为混浊的湖。塔拉壕乡的塔拉，系蒙古语，全称为哈拉斤塔拉，意为光秃的平地，或称哈拉特日塔拉，意为斑驳的平地，因植被稀疏显得斑斑点点而得名。添漫梁乡阳塔村查干梁、查干沟的查干，系蒙古语，

意为白色。混都伦川，系蒙古语意为横，古代蒙古族习惯把日出方向称南，日落方向称北，故南北流向的混都伦川，谓之横。水多湖川，系蒙古语，意为笔直。乌尔图河，系蒙古语，意为长。扎尔格河，系蒙古语，意为胶泥。添尔漫梁乡的添尔漫，是贴日门希利的转译，意为磨盘，因此地象磨盘而得名。罕台庙乡布拉格沟村的布拉格，系蒙古语，意为水泉子。该乡阿布亥村的哈达图，系蒙古语，意为石头很多。该乡乌德呼村，系蒙古语，意为门嘴子（沟门象门嘴子）。该乡色连村的色连，系蒙古语，是“萨拉”的变音，意为岔子。羊场壕乡营盘壕村淖尔沟的淖尔，系蒙古语，意为水泡子。潮脑梁乡阿贵沟的阿贵，系蒙古语，意为仙洞。塔拉壕乡农林村的哈日布拉格，系蒙古语，意为黑水泉子，因此地炭岩层流出黑水。漫赖乡莫日古勒庆村的莫日古勒庆，系蒙古语，意为对峙的山。该乡陶壕漫村的陶壕漫，系蒙古语，意为锅底形凹地。柴登乡板旦梁村的板旦，系蒙古语，意为滚圆光秃的山丘。布日都梁乡的查干布拉格村，系蒙古语，意为清水泉子。该乡乌素图村的乌素图，系蒙古语，意为水源丰富。泊尔江海子乡奎素村的

奎素,系蒙古语,意为“肚脐”(平地中间有个小海子)。巴音敖包乡巴音布拉格村的巴音布拉格,系蒙古语,意为水源丰富。布日都梁乡达尔汗壕村的打坝渠,系蒙古语,是“达瓦”的变音,意为山岭。该乡查干布拉格村的古日本绍荣,系蒙古语,意为三个尖峰,该乡吉劳庆村乌兰陶勒盖,系蒙古语,意为红山头。塔拉壕的红泥塔村,因此处有红泥而得名,该乡酸刺沟村的白泥渠,因有白泥而得名。柴登乡台什村阿斯日沟的阿斯日,系蒙古语,意为楼阁,其周围地形为层迭状。

**三、以人物命名的地名。**羊场壕乡巴音门克村的巴音门克,是一位蒙古族牧民叫巴音门克的,在此放牧而得名。漫赖乡宗兑村和柴登乡宗兑村的宗兑,系藏语,意为经选,清代有蒙古族喇嘛叫宗兑的在此居住,并在自己的住宅一旁建成敖包,放垦后人们习惯叫宗兑敖包。潮脑梁乡阿桂沟的吴坝塔,清代有一位叫吴坝的蒙古人住在此居住。潮脑梁乡店沟村的巴图沟,早年有一位叫巴图的蒙古人住在此居住。布日都梁乡布日都梁村的刀劳岱沟,早年有一位叫刀劳岱的蒙古人住在此居住。羊场壕乡马莲村

的三台基,系蒙古语,是“赛台基”的变音。蒙语,赛,即好的意思,台吉是蒙古贵族的爵号,早年此地住着一位蒙古人,为人善良,人们叫他赛台吉。羊场壕乡陈家渠村的宋家渠,原通称巴彦渠,是一位叫巴彦(汉名白富喜)的蒙古人住在此地。放垦后宋氏迁此,易名宋家渠。漫赖乡海子湾村扳定沟的扳定,系蒙古语,意为小喇嘛,此处曾居住过一位蒙古族小喇嘛而得名。阿布亥川,系蒙古语,意为公主。传说曾有一位公主在此川被洪水冲走,故名阿布亥川。

四、以动物命名的地名。潮脑梁乡的潮脑,系蒙古语,意为狼多的地方。该乡亚麻图村的亚麻图,系蒙古语,意为山羊多的地方。布日都梁乡达尔汗壕村补洞沟的补洞,系蒙古语,意为野猪。塔拉壕乡塔拉壕村的蟒盖图,系蒙古语,意为蟒蛇多的地方。漫赖乡海子湾村达嘎沟的达嘎,系蒙古语,意为二岁马驹,相传一位蒙古族牧民的一匹心爱的二岁马驹死于此沟,牧民常思念马驹而给此沟起名达嘎。羊场壕乡的羊场壕,是原郡王旗东协理恩克台吉的羊场而故名。添漫梁乡枳机塔村马场窑沟,垦前是蒙古族牧民放马牧场。潮脑梁乡店沟村的狸猫

窑子,放垦时,农民住的旧窑洞内有一只狸猫出入而得名。

**五、以植物命名的地名。**巴音敖包乡布日格斯太村的布日格斯太,系蒙古语,意为沙柳丛生的地方。泊尔江海子乡布碌梁村的哈拉汗图,系蒙古语,意为荨麻丛生的地方。塔拉壕乡巴龙图村的巴龙图,系蒙古语,是“巴拉贡图”的异写,意为长满水柏枝的地方。添漫梁乡添漫梁沟村的乌拉素,系蒙古语,意为杨树。该乡枳椇塔村的枳椇塔,是生长枳椇的塔地。麻黄湾,是生长麻黄的湾子。塔拉壕乡的旧庙沟村的柳林沟,此沟长满乌柳而得名。该乡的酸刺沟村,因过去长满酸刺而得名。羊场壕乡的马莲村,因过去长有马莲草而得名。该乡碾盘梁村杏树坡,生有杏树而得名。布日都梁乡达尔汗壕村的刘家渠,形成村落初称檀树塬,因过去生长檀树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海壕村榆树坡,因此地榆树较多而得名。

**六、以道路命名的地名。**鄂尔多斯牧地放垦前后,有一条从神木、府谷通往杭锦旗盐海子的运盐大路,途径东胜境内,泊尔江海子乡塔拉村的盐路,巴音陶勒盖村的盐路渠,柴登乡



折家梁村盐路壕，板旦梁村的盐路沟，都以此运盐之路得名。泊江海子乡的公路畔村，和羊场壕乡营盘壕村公路畔，都因东(胜)——乌(海)公路横穿而过，故取名公路畔。柴登乡的白家壕村的大路壕，是因乌审旗至达拉特旗的大车路通过此处而得名。该乡柴登村的二马路，意为二马并行之路。

**七、以敖包命名的地名。**敖包，系蒙古语，意为在平台高地上用石头、柴草、树枝堆集起来的堆形物。敖包是蒙古族信奉萨满教的重要祭祀象征，也是蒙古族最早在茫茫草原上识别方向、道路的标志，塔拉壕乡农林村的巴音朝格图敖包，汉语称神山敖包，是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准格尔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和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达拉特旗)的界标。布日都梁乡敖包图村的巴音吉朗图敖包，是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和鄂尔多斯左翼中旗的界标。巴音敖包乡的巴音敖包，是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和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杭锦旗)的界标。漫赖乡垛子梁村的白特敖包，即垛子敖包，是特并(驿站)敖包。罕台庙乡板素壕村的板素壕敖包，系满语，松素是贝子的讹转。羊场壕乡巴音门克村

的巴音门克敖包,是郡王旗一位蒙古族叫巴音门克建树的户家敖包。

**八、以召庙命名的地名。**泊尔江海子乡塔拉村的桃力庙,藏名热希朋苏圪岭。曾是东胜境内的一个大庙,桃力,系蒙古语,意为水已干枯的池塘,后塔拉村一带通称桃力庙。该乡巴音陶勒盖村的巴音陶勒盖,系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丘,清代在此建巴音陶勒盖庙,此庙虽于民国 22 年(公元 1933 年)迁到布日格斯太庙,但此地仍称巴音陶勒盖。漫赖乡莫日古勒庆村,系蒙古语,意为对峙的山,清代在此建莫日古勒庆庙而得名。巴音敖包乡沙日塔庙村的沙日塔。系印度语,是“咱们塔”的变音,意为舵手,因此地曾建有沙日塔庙而得名。塔拉壕乡四庙村,清代在此建什拉哈达召(庙),什拉哈达,系蒙古语,意为黄色石头,后来人们称此地为旧庙沟。羊场壕乡的大庙梁村,因民国 8 年(公元 1919 年)在此建丰盛寺(和尚庙)而得名。

**九、以寨子命名的地名。**布日都梁乡查干布拉格村的寨子梁,是民国 23 年(公元 1934)在此筑东胜县东区寨子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

海壕村寨子梁是民国 23 年(公元 1934 年)所建四牌寨子而得名。漫赖乡垛子梁村的寨子梁,是曹氏于光绪 28 年(公元 1902 年)从包头迁此定居,民国 22—24 年(公元 1931—1935 年)为了防土匪,建了曹柜寨子而得名。巴音敖包乡沙日塔庙村的寨子梁,是贺根尧于民国 24 年(公元 1935 年)在此建寨子而得名。

**十、以作坊、手工匠、旅店命名的地名。**如塔拉壕乡的碾房渠村,是民国初张氏在此设碾房而得名。罕台庙乡隆盛兴村的油房渠,因光绪 30 年(公元 1904 年)在此处建起油房而得名。该乡九成功村的油房圪台,是光绪 25 年(公元 1899 年)在此建油房而得名。添尔漫梁乡添尔漫梁村的毛匠渠,因此处曾有一位小手工毛匠居住而得名。漫赖乡海子湾村的铁匠壕,因光绪 30 年(公元 1904 年),铁匠乔氏从郡王旗迁此居住而得名。潮脑梁乡的店圪卜村和店沟村,是民国年间高氏等在此开车马店而得名。

**十一、以商号命名的地名。**东胜境内最早设商号的地方是羊场壕乡营盘壕村的万盛西,是清光绪 14 年(公元 1888 年)在此处设立的

一个商号名。罕台庙乡的九成功村,是清光绪30年放垦后有九户农民迁此,其中有一户设商号取名“九成功”。巴音敖包乡布日格斯太村的广义德沟村是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在此建商号“广义德”而得名。该乡的扎日格沟村的全胜功,是光绪34年(公元1908年)薛氏商号“全胜功”由包头迁此得名。罕台庙乡的隆盛兴村,是清光绪年间在此地设商号“隆盛兴”而得名。布日都梁乡吉劳庆村的余庆盈,是清光绪末年所设商号“余庆盈”而得名。

**十二、因垦务所形成的地名。**漫赖乡漫赖村的高家村原称户口地巴拉尔,实际为糊口地,放垦后蒙古族牧民生存条件被剥夺,以独贵龙形式反对放垦,逼得清朝及王公在放垦的同时给蒙古族每户最少一份糊口地,因户户都有,简称户口地。巴音敖包乡的十股壕村,是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放垦时神木人呼氏买下一大片土地,分为十大股而得名。漫赖乡海子湾村的两顷半,在光绪33年放垦时有一户富户买下两顷半地(250亩)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公路畔村的刘家坡,原称五份奎,在清光绪33年放垦时有五户买下五份土地,同时

有一户设商号“五份奎”而得名。

**十三、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从山西、陕西来的垦植移民越来越多。随着牧地开垦面积的扩大，人口的迁徙，原来的大地名已满足不了人们交往的需要，增加许多冠以姓氏加地形的小地名。如布日都梁乡乌素图村的白家渠，是光绪 22 年(1896 年)白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潮脑梁乡店沟村的丁家沟，是清末丁氏来此居住而得名。羊场壕乡马莲村的温家梁，是民国 5 年(公元 1916 年)温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柴登乡柴登村的武家壕，是光绪 29 年(公元 1903 年)武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海畔村的王家村社，是民国 16 年(公元 1927 年)王氏来此居住而得名。巴音敖包乡扎日格沟的杭家塔(川沟畔淤澄积起的平地称塔)是民国 14 年(公元 1925 年)杭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奎素村的郭家坡，是民国 7 年(公元 1918 年)郭氏来此居住而得名。羊场壕乡林场村的王家湾，是民国 31 年(公元 1942 年)王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添漫梁乡海子村薛家圪台(洼地或沟川一侧的较高平台地称圪台)，是光绪 30 年(公元 1904 年)

薛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海壕村的赵家湾,是光绪 17 年(公元 1891 年)赵氏来此居住而得名。羊场壕乡羊场壕村的圪堵社,原称张进财圪堵(平地上突出的小丘称圪堵),是光绪 26 年(公元 1900 年)张氏来此居住而得名。巴音敖包乡扎日格沟村的袁家圪楞(较大的沟川两畔称圪楞),是民国 5 年(公元 1916 年)袁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漫赖乡乌尔图村的李家圪旦(小山丘或平地高出的地方称圪旦),是民国 31 年(公元 1942 年)李氏来此居住而得名。罕台庙乡九成功村的丁家山,是光绪 31 年(公元 1905 年)丁氏来此居住而得名。布日都梁乡查干布拉格村的张家畔(地形处川、沟、河两岸称畔),是清光绪 33 年(公元 1907 年)张氏来此居住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公路畔村的苏家圪卜(周围高中间低洼的地方称圪卜)是光绪 12 年(1886 年)苏氏来此居住而得名。塔拉壕乡农林村的张家圪坨(山梁中间的凹地称圪坨),是光绪 30 年(公元 1904 年)张氏来此居住而得名。布日都梁乡灶火壕村的郝家口子,是民国年间郝氏来此居住而得名。

十四,以方位命名的地名。如罕台乡色连

村的东色连、西色连，潮脑梁乡平梁村的南沟，罕台庙乡元圪旦村的上杨家渠、下杨家渠，羊场壕乡碾盘梁村的碾盘梁前社、碾盘梁后社，羊场壕乡沙渠村的东沙渠、西沙渠、南门等。

**十五、以数序命名的地名。**如漫赖乡垛子梁村的一社，该乡漫赖村的二社，该乡陶壕漫村的三社，该乡乌尔图村的四社，该乡漫赖村的五社、东七社、西七社，羊场壕乡郝家圪卜村的六社等。

**十六、新时代地名。**如漫赖乡莫日古勒庆村的五五社，是因 1955 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名。泊尔江海子乡台什村的红光社（原在此设商号“成德奎”，后人们称成德奎圪卜）和光明社（原称王满喜）。塔拉壕乡的农林社，是农村合作化时形成的地名。该乡农林村的常青社（原称哈日布拉格“文革”中以此处有古松柏而更名为常青队）。

**十七、其它类型的地名。**塔拉壕乡格舍壕村的格舍，系蒙古语，意为碑，传说此处树有一块碑（何碑不详）而得名。柴登乡宗兑村的学校圪台，解放初在此建柴登壕小学而得名。羊场壕乡林场社是盟林工站于 1954 年在此建立苗

圃而得名。该乡碾盘梁村的石油厂东社、石油厂西社,是1958年在此处建立油页岩炼油厂而得名。柴登乡柴登村的水库圪旦,是1958年在此处修筑水库,在靠近水库西南有一高丘称水库圪旦。泊尔江海子乡塔拉村的新房湾,是杨氏于1941年在此新盖了房屋,同时也是当时此处唯一的房屋而得名。添漫梁乡添尔漫沟的交界沟,是因此沟为达拉特旗与东胜交界处而得名。布日都梁乡达尔汗壕村的戏台壕,是民国初,农民自发在此处修建了一戏台而得名。市境北部的哈什拉嘎川的哈什拉嘎,系蒙古语,意为围墙或畜圈。潮脑梁乡亚麻图村的卜亥窑子,卜亥是“布尔汗阿贵”的讹转,意为神,清代蒙古族喇嘛在此处一窑洞内供佛而得名。柴登乡城梁村的文贡沟,文贡,系蒙古语,意为神灵,据说清末此地有一棵大树被奉供为神树。布日都梁乡敖包图村的韩家沟,原名忽沙图,系蒙古语,意为围墙或畜圈。该乡灶火壕村的赵家渠,原称塔布呼都格,系蒙古语,意为五眼井。泊尔江海子乡布碌梁村的布碌,系蒙古语,意为碌碡。罕台庙乡乌德呼舒村的特尔格沟,特尔格,系蒙古语,意为车或轿车。布日



都梁乡灶火壕村,灶火,系蒙古语,是“珠合”的变音,全名为“珠合达布孙扎布”,意为炉灶,因此处在清末为运盐之路,挖有运输途中的做饭炉灶。

东胜市境内乡、村原通称的地名只有 89 个,从清末民国初开垦至现在,80 多年的过程中,地名也由通称的 80 多个增加到 460 多个。其中渠冠姓氏的地名有 87 个、梁冠姓氏的有 46 个、沟冠姓氏的有 51 个、坡冠姓氏的有 26 个、壕冠姓氏的有 46 个、村冠姓氏的有 37 个、塔冠姓氏的有 19 个、湾冠姓氏的有 16 个、圪台冠姓氏的有 10 个、畔冠姓氏的有 10 个、圪堵冠姓氏的有 8 个、圪旦冠姓氏的有 7 个、圪楞冠姓氏的有 6 个、还有圪坨、口子、山、塬冠姓氏的各有 1 个。

# 野味滋味趣

春天

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东胜一带地方,生长着许许多多奇异的野生植物,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野生植物,无论是风沙侵袭,还是酷暑严寒,它们总是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倔强地生长在沙漠荒岭中的沟沟壑壑、梁梁抓抓、湾湾叉叉地带。它们之中有的属宝贵的野生药材,有的是牛羊的丰美饲料,而且还有很多人们喜欢食用的野味。以下就是当地人们普遍最喜爱的几种野生调味植物。

**地椒:**春天,只要步入东胜市郊及野外的山梁梁、沙湾湾、圪塆塆、崖畔畔,就可以看见一簇簇、一丛丛油绿油绿的一种野生植物,那就是地椒。地椒的叶呈三瓣形状,用细细的叶茎顶着,三瓣之间互相连结,只是每瓣叶边带有两个小弧度,很象一种叫“夜合梅”花的叶子形状。春天发芽后,刚长出的叶子嫩绿嫩绿的,随着叶片的长大变老,逐渐由油绿变为红色、

紫色和深紫色。开出的小花为紫蓝色(深藕合色),再配上那铺在地面上的一丛绿(或紫)色的叶,不仅让人觉得艳丽夺目,就是羊群也是哪里地椒多,长的旺盛就往哪里跑。地椒是羊很喜欢吃的一种饲草,羊吃了地椒,经过消化,吸收了地椒内的养份,通过血液循环,遍及全身,因而,伊克昭盟地区的羊肉格外好吃,这好吃的羊肉内又属东胜境内和与东胜毗邻的准格尔旗所产羊肉更为别具一格。这大概就是牧羊人很注意让羊群吃到地椒的原故吧。

无论你走到哪里,随意采撷一点儿地椒,用手一搓,一股浓浓的花椒味刺入鼻腔,会使人感到比日常食用的花椒粉要强烈几倍。地椒不仅是羊群的好饲料,它还是调味佳品,比如熬、炖狗肉、驼肉,采撷一把地椒洗净放入肉锅内,炖出的狗肉、驼肉等味香色美,不带一点儿腥膻气味。它的确称得上一种奇异的野生植物。

**沙葱:**叶子圆状,细而且又长,生长在沙坡坡、沙湾湾地方,是一种耐旱性极强的野生植物。早年间,高原梁外地区上的人们用它来作为充饥渡荒的食物。沙葱不仅能充饥,还是一

种调味品。梁外地区的农牧民制做凉粉、碗坨儿、粉皮、粉卷、山药(马铃薯)丸子时,都爱放入些炆过油的沙葱来调味。也可将它采回后洗净腌成咸菜食用。把洗净的沙葱切碎与羊肉合拌为馅,包成饺子,吃到嘴里,满口清香,真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食。

**榨门:**叶与沙葱叶相似,比沙葱叶还细,生长在山梁石缝里或有碎石子的硬地上。花浅紫色(或粉白色),是一种生长力极强的野生植物,几个月不见雨水,仍然顽强地生长在硬石子地上。夏末秋初季节,嘎查(村)的农牧民去采撷榨门的花,(当地叫叨榨门花,用中指、食指将花从茎上夹住,向上一揪,一朵一朵叨得相当快。)洗净,放入适量盐末捣碎,做成小饼,用线串起来,挂在阴凉处晾干,做菜时待油锅烧热了捏一点儿放进去(炆锅),当时即香味四溢,炒出的菜别具一味。农牧民吃拌汤、山药丸子都爱用榨门花调味。

**发菜:**这真是一种珍奇的野生植物。说不清是它的叶子还是茎,又细又长,呈黑色,与人的头发无二般。它与高原上其它野生植物混杂在一起生长,但发菜紧紧地爬在地皮上,故当

地农牧民又叫它“地皮菜”，也叫“羊毛地圪圪儿”。

捡发菜也是有诀窍的，必须是待稍阴一点儿的天气，细如发丝般的发菜才能呈现在人的眼前。天太晴朗是不能捡到发菜的。捡发菜的人们手拿一截小木棒（细棍棍），一剜一剜的，就可以把它们从地皮上勾起来。如果天气阴的适宜，每人每天可以捡到一、二两呢。特别是春、夏、秋的稍阴天气，捡发菜的人们遍布山梁、山坡，仨一群两一伙，就说就聊地就把钱捡回来了。发菜的营养价值很高，又是出口创外汇的畅销品，就连当地农牧民也是在逢年过节或来了亲朋好友时，等饭菜上完，最后再上一个发菜汤。发菜下到锅内开水中，煮一小会儿就能吃了，吃到嘴里很津气，就象嚼着极细的海带丝一样的感觉。

再者“发菜”与“发财”谐音，所以人们过节时用它，意味着发财，朋友们来了用它，祝朋友们喝了发菜汤也取发财之意。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东胜文史资料·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9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